



金融与发展

2020年9月号

莱因哈特和罗格夫谈债务
第12页

征服不平等的鸿沟
第17页

经济学中的种族问题
第36页

韧性 弥合裂痕



目录

4

我们必须利用这次危机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以及全球范围内建立新的、更牢固的联系。

韧性：弥合裂痕

- 4 对全球韧性的再思考
新冠疫情之下，各国经济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唯一的出路是国际合作
伊恩·戈尔丁
- 10 噩梦般的“奈特氏不确定性”
在新冠疫情的世界里，风险将变得更加危险
杰弗里·冈本
- 12 新冠疫情下的债务问题
需要采取新的措施来解决主权债务问题
杰里米·布洛、卡门·莱因哈特、肯尼斯·罗格夫、克里斯托弗·特雷贝施
- 17 征服不平等的鸿沟
新冠疫情暴露出巨大的不平等，但现在行动还为时不晚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 20 培养全球金融合作
当前的危机凸显了加强全球金融架构的紧迫性
巴里·艾肯格林
- 24 改革卫生系统
作为各国抵御危机的第一道防线，卫生系统需要予以强化
珍妮薇·费尔南德斯
- 28 投资绿色复苏
新冠疫情只是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的一个前奏
乌尔里希·沃尔茨
- 32 种族主义给我们所有人造成的代价
解决系统性种族主义是一项道德使命；同时它也可以让经济更强大
约瑟夫·洛萨维奥



42

本期还有

- 36 **经济学中的种族问题**
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需要敲响警钟,以根除种族歧视
马丁·契哈克、蒙特福特·姆拉契拉、拉特纳·萨哈伊
- 39 **是敌是友?**
科技可以提升韧性,但也能加剧不平等,取决于你如何使用它
安德里亚斯·阿德里亚诺
- 42 **肖像画: 坚韧的样子**
由于疫情颠覆了他们的世界,三个人在应对变化
拉斐尔·阿尔维斯、阿里安娜·林奎斯特、K.M.阿萨德
- 54 **一盎司的预防**
我们的疫苗融资方法不适合应对疫情风险
大卫·E.布鲁姆、丹尼尔·卡达雷特、丹尼尔·L.托尔托里斯

其他内容

- 48 **经济学人物**
经济学界的鼓动者
鲍勃·席米森采访伦敦大学学院的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她是一位政府主导创新的坚定支持者
- 52 **前沿**
坚持到底
牙买加前央行行长布赖恩·温特解释货币政策现代化过程中的挑战
- 58 **图表释义**
粮食安全
新冠疫情正在引发全球新一轮粮食危机
亚当·贝苏迪
- 60 **回归基础**
什么是债务可持续性?
一个经济体能够安全承担多少债务,取决于多个因素
达莉亚·哈库拉
- 62 **书评**
《愤怒经济学》
埃里克·朗尼根、马克·布里斯
《归属经济学》
马丁·桑德布
- 64 **货币**
创造历史
突尼斯以新版10第纳尔纸币纪念该国第一位女医生
梅琳达·韦尔

54



48

照片: TANIA/CONTRASTO/REDDIX



裂痕中的光芒

当世界回归正轨时,我们将面临许多未知。丢掉的工作会失而复得吗?我们的出行方式是否还与之前一样?社会经济复苏将会是什么样子?目前来说,太多问题还只是一个问号。我们知道的是,新冠疫情以极其惨烈的方式将现有的经济社会不平等问题暴露出来并予以扩大,催生出新的隔阂。它加剧了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对年轻人、女性和教育程度最低群体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公共卫生系统更加脆弱,工作更不稳定,数字鸿沟更加严重。它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挑战,使其面临着比以往更高的支出需求和不断膨胀的债务。与此同时,它也暴露了一直潜藏在社会中的种族不公。

然而,这场危机及其所暴露出的问题也让一部分人有所反思,他们呼吁社会重新思考自身的优先事项,并重新审视世界经济的结构,以使其朝着一个更公平、更可持续、更具韧性、适应性更强的未来发展。本期《金融与发展》将就全球社会面对疫情的必选事项这一话题向您介绍多位背景各异的作者的见解。

“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网络化问题可以通过网络化的方案来解决。”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写道。他认为,国际合作不仅需要政府努力,也需要民间社团和企业参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主张重写经济规则以保护工人和环境,并呼吁全球各国和各国内部加强团结。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等人探讨了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最贫穷国家债务重组浪潮的问题。其他作者则关注了数字技术、气候问题和包括疫苗研发在内的公共卫生等领域的相关话题。

较之从前,新冠疫情后的世界将发生重大变化。如果这场危机后,各国能推出以民为本的政策,且若这些政策能够体现出为人类整体命运负责的精神,并以此推动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根本改变,那自然更好不过了。世界终将翻过这灰暗的一页,且更具韧性。用词曲作家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的话来说就是:“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FD**

吉塔·巴特(GITA BHATT), 主编



本期封面

2020年9月号讨论了新冠疫情危机暴露出的各种问题,与此同时,又表达了对世界将重新恢复活力所抱持的希望。插画家达维德·伯纳茨(Davide Bonazzi)在本期封面上将这种韧性比作一枝从干涸大地上露出的新芽。

主编: Gita Bhatt
执行编辑: Maureen Burke
高级编辑: Andreas Adriano
Adam Behsudi
Peter Walker
数字编辑: Rahim Kanani
在线编辑: Lijun Li
生产经理: Melinda Weir
文字编辑: Lucy Morales
编辑顾问:

Bernardin Akitoye
Celine Allard
Bas Bakker
Steven Barnett
Nicoletta Batini
Helge Berger
Paul Cashin
Luis Cubeddu
Alfredo Cuevas
Era Dabla-Norris
Rupa Duttagupta
Tommaso Mancini Griffoli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Christian Mumssen
İnci Ötker
Catriona Purfield
Uma Ramakrishnan
Abdelhak Senhadji
Alison Stuart

©202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版权所有。
如需翻印本刊文章,可通过填写在线表格(www.imf.org/external/terms.htm)或发送电子邮件至copyright@imf.org进行申请。如用于商业用途,可通过版权税计算中心(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www.copyright.com)获得授权,并支付一定的象征性费用。

本刊的文章和其他资料仅为作者本人观点,并不反映IMF的政策。

订阅服务、地址变更和其他广告事宜,请联系:
IMF Publication Services
Finance & Development
PO Box 92780
Washington, DC, 20090, USA
Telephone: (202) 623-7430
Fax: (202) 623-7201
E-mail: publications@imf.org

《金融与发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季刊(地址:700 19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语出版。

中文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翻译出版。
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大厦
电话:010-88190916
传真:010-88190916
邮政编码:100142
网址:<http://cfeph.cfemg.cn>
英文版刊号:ISSN 0145-1707
中文版刊号:ISSN 0256-2561



FSC FPO

杜绝公共投资中的浪费

《善用投资》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各国如何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治理实现对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利用。书中涵盖了一系列重点问题，如基础设施投资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管控腐败、财政风险管理以及在项目评估与选择中识别出最佳实践等。本书还讨论了基础设施治理的新领域，如公共基础设施资产的维护和管理、气候变化抵御能力建设等问题。

“运转良好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大部分基础设施将由公共部门提供。为了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质量和数量，完善的治理是重中之重……然而，如何将愿望转化为行动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难题，本书以富有思想性和启发性的文笔对其中所需的治理进行了论述。这是一份极其宝贵的贡献。”

尼克·斯特恩（NICK STER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



“基础设施（如今也包括卫生基础设施）投资，将成为国家经济战略的核心。较之于投资的数量，投资的质量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但它其实可能比前者更重要。本书极具价值，从乍得到中国、再到美国，这本书对许多国家都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哈佛大学教授兼名誉校长

价格35美元。2020年秋季。
平装本。ISBN 978-1-51351-181-8

更多信息请访问bookstore.IMF.org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对全球 韧性的 再思考

新冠疫情之下，各国经济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
唯一的出路是国际合作

伊恩·戈尔丁

一名感染乘客从武汉飞往米兰，一种计算机病毒侵入互联网系统，一场源于美国中西部的次贷违约引发全球经济危机。机场枢纽、光纤电缆、全球金融中心——这些极大普及全球化益处的传播中介，同时也使各种问题广为扩散。这就是全球化的“负蝴蝶效应”，是我们这个高度互联的世界所特有的系统性风险，在这个世界里，发生在某个地方的十分微小的事件可以迅速蔓延，并最终影响全球。

我的书《负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Defect) 揭示了为何全球化会产生系统性风险，也讨论了为何终止全球化并不会阻断全球威胁，反而会加剧和放大它们。世上没有一堵墙高到足以阻挡气候变化、大流行病和其他灾难性的风险。但国与国之间的高墙会降低我们合作的可能性，削弱我们对人类共同风险的管理能力。保护主义阻碍了能创造就业、提高收入的投资、贸易、旅游和技术进步，削弱了各国提升韧性的能力。这一切问题的出路在于全球合作，让全球化变得安全和可持续，而不是相互对抗。

当今世界需要优秀的领导力来管理全球化消极的一面，并收获其积极的一面，从而确保全球化的进步不会被共同的威胁所压倒和吞噬。对于一个拥有良好韧性的系统而言，其总体强度如何，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阻止下一场可能比新冠疫情危机更严重的疫情，必须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项首要任务。这需要加强和改革世界卫生组织，使其拥有必要的治理、人力和能力，从而成为应对全球卫生问题的快速反应力量。

近几十年来，全球化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其发展速度大大超出各种机构缓慢演变的速度；我们的各种系统日益复杂，但我们对其的风险管理方法却并未取得相应进步，二者之间的差距甚至日益扩大。正如我们在金融危机和当前的新冠疫情危机中所看到的那样，系统性风险可能会迅速压倒此前看似稳健的进程。这场疫情造成的威胁固然毋庸置疑，但气候变化造成的缓慢但却不断累积的危险也同样需要各国协调一致，共同采取行动。

此次疫情凸显了我们对自然威胁缺乏免疫力，但它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重新调整经济的机会。我们看

到很多关于绿色刺激政策的提议，它们提供了一种可能，让我们有望更好地重建经济并加速完成从化石燃料向新能源的转变。从气候抗议到种族示威游行，全球范围内的抗议活动显示了人们对新思维的渴望。新冠疫情危机也表明，在必要时人们能够改变自己的行为。剩下的就是由各国政府来采取行动了。

需要网络化的解决方案

新冠疫情危机表明，国际社会亟须提高全球风险管理能力。此外，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和先前的金融危机也都提醒着我们这一点。我们亟须改革，以驯服全球化的负蝴蝶效应。

这些网络化的威胁要求我们必须对系统的所有部分都做出改变。要想真正行动起来，就必须从改变个人行为做起——例如，戴上口罩，逐渐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韧性不能委托给别人，它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企业应将审慎水平的闲置营运资金视为一项对韧性的宝贵投资，而不应为了尽量加杠杆而将其作为冗余砍掉。通过“准时制”生产(just-in-time)或精益管理系统最大限度减少资本或闲置产能的做法可能削弱韧性。近些年，从埃亚菲亚德拉火山爆发、日本东北地区海啸、卡特里娜飓风到玛丽亚飓风，再到当前的新冠疫情，各种灾难接连不断，监管机构应当从中吸取教训，认识到这样一点，即过于普遍的精简实践会让系统变得脆弱。

我们的金融、数字、贸易以及其他系统通过各种复杂的网络交织在一起。其中的交叉节点和枢纽全部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地点，比如全球金融中心、主要的港口和机场等。将物流或其他节点集中在同一个位置会使它们经受不起冲击，将重要人员和信息集中在总部大楼的做法同样如此。提高地域多样化有利于增强韧性，但人们尚未将此纳入竞争政策或风险管理战略中。

越来越多具有前瞻性的公司股东和经理人表达了对于提高公司抵御系统性冲击的能力的愿望。政治家们同样热衷于增强公共部门的韧性。这一点固然值

得欢迎，但这需要更深入的分析，包括确定韧性应有多大，应能经受住何种冲击；企业和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财力或其他资源来保护自己免受所有可能的冲击。

权力下放有助于提高韧性，因为它可以使个人、企业和国家有权自主决策。但是，权力下放只能作为对更高层权力的一种补充，而非替代。对于风险管理和全球系统性风险来说，总体性原则是必要的。这就要求各国给予超国家机构一定的自主权。在这次新冠疫情危机中，无论是相对贫穷的国家（比如越南），还是较为富裕的国家（比如加拿大），所有严格遵循了世界卫生组织指导方针的国家表现都较为令人满意。各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表现上存在明显差异，这说明从多个层面上控制风险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我们需要在国际、全国、区域、地方等不同层面上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多边机构应处于这种分层级的组织体系的顶端。然而，仍有一系列“孤儿问题”缺少相应的机构负责。一些国际机构能提供气候变化相关的分析和信息，例如国际气候变化委员会，但没有一个拥有决策权和执行权的全球机构来协调应对措施。我们也没有一个主要的全球性组织来打击网络犯罪活动，以前，甚至仅仅是单独一个计算机病毒，如 WannaCry 或 NotPetya（无论其系由有组织的国家机构还是独狼式的个人所开发），也能全球传播并在数天内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这种威胁，就像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通过假新闻颠覆民主或阻碍疫苗接种运动一样，是以机会主义的方式通过全球化的数字网络传播的。这些威胁和气候变化、大流行病和恐怖主义等威胁一样，也都超越了国家边界，但目前的应对措施主要是在国家层面展开的（对于欧盟则是区域层面）。

帕累托原理认为，80% 的结果来自 20% 的成因。这个原理仍然可以帮我们实现重大改变，因为少数行动者往往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而那些主要导致问题出现的国家负有最大的责任去解决它们。在气候问题方面，少数国家和企业的总体碳排放量远远高出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二。仅纽约州地的碳排放量就超过了 45 个非洲国家，其所消耗的抗生素也超过了所有这

些国家的总和。正如“牛津马丁为后代委员会”的报告《着眼长远》(Now for the Long Term) 所言，由全球最大的国家、企业和城市组成的 C20-C30-C40 伙伴关系将涵盖足够多的重要参与者，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为解决臭氧消耗或扭转艾滋病蔓延成立的联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令人鼓舞；它让我们看到，只要坚定决心，由民众、企业和国家组成的联盟完全能够有所作为，对联合国和多边机构的事业提供支持。

21 世纪的全球治理

多边机构的成效如何，取决于其所有人的授权。为应对新冠疫情危机，IMF 简化了工作流程，为成员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然而，并非所有机构都能应对这一挑战，发展中经济体仍然迫切需要更多的多边支持。世界卫生组织本应是全球卫生领域的快速反应力量，但其在最需要发挥作用的时候却遭到了削弱。与此同时，尽管全球贸易亟待提振，但贸易战以及急需的人员任命和机构改革受阻，使世界贸易组织的效力遭到削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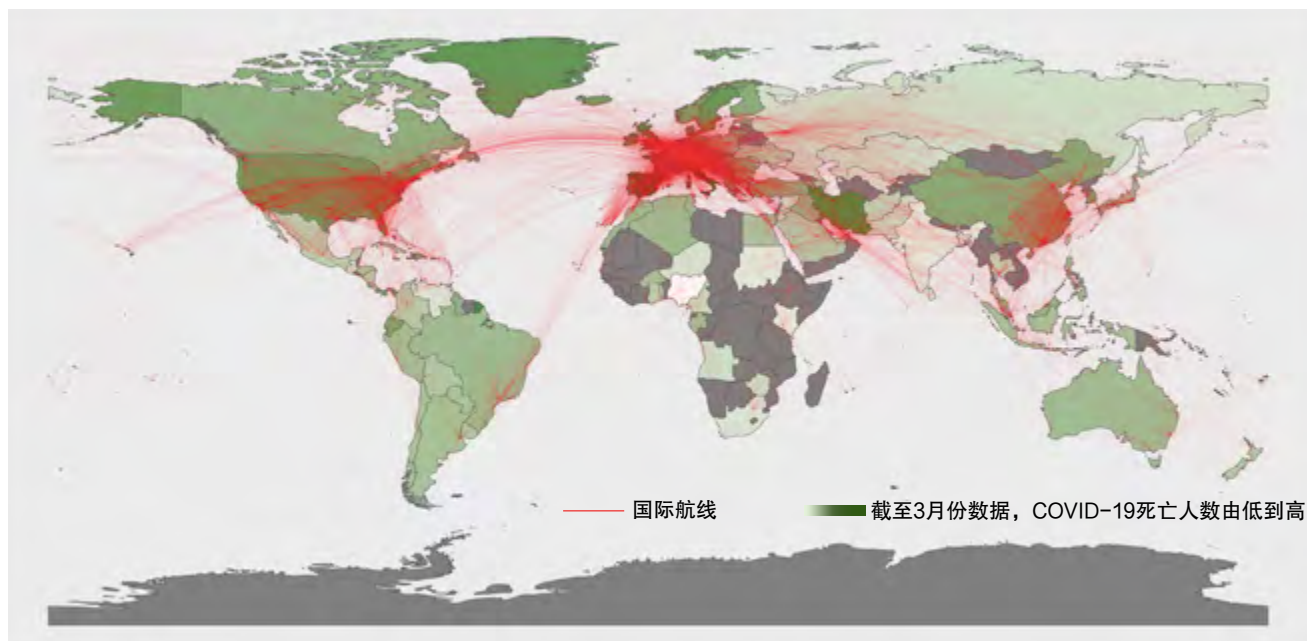
以中国为中心的机构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其中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构成“一带一路”倡议的一系列双边协议。与这些机构合作而非对抗才是明智之举，因为解决全球问题需要尽可能多的支持，也需要对更多方面进行协调。提高人员的多样性也能提升效力和机构的合法性，广泛的参与能够为世界提供力量，而不是制造焦虑。

除了需要接纳新势力的崛起和更多样化的政府观点外，私人企业的作用与日俱增，也应纳入全球架构。AWS 云服务和谷歌云目前已成为系统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而亚马逊 Marketplace 则在商业领域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脸书已成为公共卫生信息的主要发布系统，阿里巴巴则成为个人防护装备的主要供销平台；在基于应用程序的人员追踪方面，苹果和谷歌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领头羊。

和过去一样，下一场危机同样不会遵循我们的

航空公司与新冠疫情

国际航班助长了病毒最初的传播。



资料来源：死亡数据来自“用数据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航班数据来自OpenFlights.org。

旧有思维模式；要想成功应对，我们必须与了解新形势的相关方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但是，私人部门并不总是只有好的一面，我们需要独立的监管机构来管控超级明星公司不断崛起的势力。我们还需要不断更新自身的专项技能，金融危机正是由于专家和监管机构未能真正理解当时的信用衍生品而发生；面对新的威胁时，我们不可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跌倒。

四大“元骑士”

全球机构改革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我们可以和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作斗争（过去我们也一直这么做），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对抗四大“元骑士”：短期主义、民族主义、成本和俘虏。选民可以阻止政府采取长期行动，并可能支持保护主义政策，而政府本身则由于财力有限，认为有必要优先考虑当下的紧迫问题，而不是那些虽至关重要但仍未发生的问题。

新冠疫情表明，只要有意志，所有四名“元骑士”都可以被战胜。政治家的注意力范围有限，更多关注当下的问题，但受新冠疫情影响的选民们将需要长期的解决方案。美国、英国、俄罗斯、巴西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由于对疫情应对不力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选民不会原谅政府不做准备，重蹈覆辙。历史也不会原谅未能阻止灾难性气候变化的一代领导人。正如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缔造新世界秩序的令人鼓舞的领袖们告诉我们的那样，同时关注短期和长期挑战是可能的。全球性机构和私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需要有同样的作为。

新冠疫情造成的卫生和经济紧急状况表明，全球各国需要协调努力。为了防止疫情出现反复，各国需要在疫苗研发开展国际合作。为了解决熟练医护人员的长期短缺问题，我们需要接纳移民。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防范新一轮金融危机以及战胜贫困，我们必须坚持推进全球化，在充分发挥其效益的同时坚

下一场危机不会遵循我们的旧有思维模式；要想成功应对，我们必须与了解新形势的相关方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

决弥补其缺陷，尤其是与系统性风险有关的“负蝴蝶效应”。

高收入国家拥有资源——政府和选民只需要对优先事项进行调整就够了。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平均将 6% 的开支用于军事，但用于预防大流行病的开支还不到这一数字的百分之一，尽管大流行病对社会的威胁远远大于战争。在国际层面上，世界卫生组织的预算甚至比不上美国的一些大型医院。为应对新冠疫情危机，各种资源在短时间内即被源源不断地调动起来，这说明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是可以找到资源的。我们需要充分利用和发展这些经验。

金融危机凸显了群体思维和监管机构被游说集团所左右可能造成的风险。我们需要确保猎场看守人拥有足够的知识和独立性来阻止日益敏捷且拥有充足资源的偷猎者，这对保障系统的韧性至关重要。

惰性阻碍着制度改革。要想确保一个组织在治理、人员和业务等方面反映未来而非过去的需求，就必须将改革措施落实到位，使组织摆脱既得利益者的控制。但现实中，制度中到处充斥着未得到实施的善意改革。

进步是可能的，许多机构进行的根本性变革就证明了这一点。欧洲煤钢共同体曾经只是一个有限技术组织，后来发展成为欧洲联盟，并承担十分广泛的国家责任。危机也可以是催化剂。联合国、IMF、世界银行、马歇尔计划和福利国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锻造出来的。近几个月来，IMF 以创纪录的速度批准了创纪录数量的贷款，附带的条件也更少，同时其工作人员也正进行远程办公。各国政府抛

弃了旧有的规则，为劳动者和企业提供直接支持。许多曾经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都做到了。

新冠疫情造成的破坏迫使我们加倍努力，去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和更加包容的世界。这要求我们设法解决那些危及我们的生命并加剧不平等、贫困和气候变化的种种威胁。建设一个有韧性和可持续的未来需要我们所有人行动起来，从个人到全球都是如此。不仅政府层面的国际合作重要，民间团体、企业以及专业人士的合作也至关重要。我们这个时代的网络化问题可以通过网络化的方案得以解决。我们必须利用这场危机，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以及全球范围内建立更牢固的全新纽带。 **FD**

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是牛津大学全球化与发展教授，BBC 系列节目《改变世界的大流行》的主持人，也是《未知领域》（Terra Incognita）的合著者。亚历克斯·科普斯泰克（Alex Copestake）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协助。

参考文献：

- Goldin, Ian. 2018. *Development: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and Mike Mariathan. 2014. *The Butterfly Defect: How Globalization Creates Systemic Risk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oldin, Ian, and Robert Muggah. 2020. *Terra Incognita: 100 Maps to Survive the Next 100 Years*. London: Penguin.
- Hepburn, Cameron, Brian O'Callaghan, Nicholas Stern, Joseph Stiglitz, and Dimitri Zenghelis. 2020. "Will COVID-19 Fiscal Recovery Packages Accelerate or Retard Progress on Climate Change?"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6 (51).
- Oxford Martin Commission for Future Generations. 2013. "Now for the Long Term." Oxford.



照片：IMFCORY HANGCOCK

噩梦般的“奈特氏不确定性”

在新冠疫情的世界里，
风险将变得更加危险

杰弗里·冈本

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 (Frank Knight) 在其经典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中从理论上解释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别。风险是一个可以衡量的数量”。确切的结果可能无法确定，但是最有可能的几种结果的概率却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而不确定性则意味着甚至没有足够的信息来缩小各种可能性。当一种情况“不能被衡量”时，经济学家称之为“奈特氏不确定性” (Knightian uncertainty)。

如果这听起来很熟悉，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最不可测的时代。我们去工作、去杂货店或举行婚礼时，相关的风险很难量化，这个简单的事实打乱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有必要保持乐观，但是我们在新冠疫情的治疗和疫苗上仍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它们何时可用、它们的效力如何、人们有多大意愿使用它们，都不确定。重建经济、恢复就业和重新实现增长需要数年时间，此

次疫情也将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持久影响。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混乱让许多德国人至今对通货膨胀心有余悸；经历过大萧条的美国人终其一生都很节俭。这场疫情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看待以及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方式，这对投资决策、商业战略、政府政策以及整体经济生产力都将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在个人收入突然大幅减少后，人们可能会永久性地改变对风险的看法，从而增加预防性储蓄。从短期来看，这可能意味着债务减少，但从长期来看，这种认知上的变化可能导致更深层次的结构变化，比如人们对举借30年期按揭贷款的意愿降低。在许多国家，住房拥有率很低，因为长期债务被更多视为一种风险而非机遇。如果高危人群有意避免某些活动，其消费模式可能会发生变化。消费者可能会因为害怕再次封城而决定大量囤积必需品——至少对卫生纸制造商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但是，如果有一位年轻女性，不久前她曾夜以继日地在厨房餐桌前思考一个变革性的商业创意，但如今，她的风险厌恶情绪加剧，这意味着她永远不会创立那个企业，永远不会雇佣员工，永远不会推出产品，这又会怎样呢？不确定性如此之高，这使预测如此多行为变化的净影响变得更加困难。

企业还面临着一系列新的不确定性。美国汽车制造商遭遇了零部件短缺，因为很多供货商所在的墨西哥奇瓦瓦州将工厂出勤率限制在50%以内。这种扰动可能会导致制造商对供应链进行多样化调整，或者提高零部件库存。员工健康则是另一种新的运营风险。企业会因此决定更多地依赖自动化生产吗？

更换供应商、增大库存量以及投资更先进的机械设备，给利润微薄的制造商带来了成本，但在经济衰退时期提高产品价格却又很困难。对于医疗用品等被视为“必需品”的商品，各国可能会改变相关规定或为国内生产提供补贴，从而改变竞争格局。与家庭相似，收入大幅减少的企业可能会保持较高的流动性缓冲。一旦生产的变化趋于稳定，对收益的影响变得清晰起来，有些变化可能会变得可以量化，但对许多企业来说，不确定性

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市场波动、违约和不断变化的监管将改变金融业的格局。疫情暴发初期，市场环境和资产价格曾出现剧烈波动，这不仅会改变风险管理模式，也会对为管理此类风险所持有的流动性和资本缓冲产生影响。监管也可能发生变化，因为政策制定者会采取措施防止波动再次出现，这也会降低央行开展干预、维持市场正常运转的必要性。此外，经济衰退也将增加损失。

经济决策者面临着一个复杂的新难题：在收入下降和债务膨胀的情况下，如何为更高的支出需求融资？如果卫生危机始终得不到解决，各国政府在对未来进行规划时将面临无法衡量的变数。私人通过提供担保或直接购买其所有权对私人部门进行干预的做法，除了对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产生直接影响外，还可能对市场竞争和私人部门的风险承担行为产生持久且难以量化的影响。

这一切对 IMF 意味着什么？我们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在短时间内向众多国家提供紧急援助，受援国数量之多创下新的纪录。我们推出了新的支持性贷款便利，并扩大了现有贷款便利的借款额度。

IMF 面临新的运营挑战。许多国家请求 IMF 提供财政援助以渡过这场风暴。一些国家债务负担相当严峻，在经济增长和贸易前景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其债务的可持续性难以衡量。在后疫情时代，如果一些国家确实需要就其债务进行重新谈判，鉴于私人部门作为债权人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其需要在提供融资保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以降低不确定性。我们的成员国也在寻求政策建议和帮助，以增强能力来应对这一严重冲击。目前，我们大部分时间仍然只能远程工作，而且无法出行，我们必须在这种情况下作出反应。但是，类似这样一些运营限制已经影响了我们一些重要“原材料”——即及时准确的国家统计数据——的生产工作。

事实上，作为我们的核心职能之一的“经济监督”已经不得不进行自我改造。回到奈特的概念，我们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衡量并解决可量化的风险上。我们使用宏观经济数据来创建基线情景并预估其可能性。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

这一做法进行了拓展，他们建立了各种情景并分析了各种情景的可能性，以便更好理解数字预测的相关风险。

新冠疫情冲击巨大，且对世界各国同时造成了影响，这导致了极端的奈特氏不确定性和大环境的不断变化。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变得更加敏捷和灵活。当新冠疫情还只是中国暴发的一场疑似肺炎的疫情时，我们就联系了流行病学专家，了解如何将他们的预测模型和我们的模型结合起来。我们在模型中使用了新的大数据来源，以了解消费者行为的变化，这一点是传统统计数据无法做到的。甚至在此次疫情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使用类军事模拟来研究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态势。当我们试图量化新的风险时，这种方法被证明是有用的。

前段时间，我读到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位美国流行病学专家如何与一家德国再保险公司合作开发大流行病保险产品。他们设计了卫生模型和早期预警系统，估算了脆弱行业可能受到的经济影响，并确定了如何分配风险。该项保险产品于 2018 年底推出，但潜在客户认为，对于这样一种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来说这个产品太昂贵了。当这场灾难在 2020 年初发生时，购买保险已经太晚了。

这个具有警示性的故事表明，我们有多么需要改进风险评估和管理。例如，对于供应链，制造商在考虑贸易、物流和卫生条件等因素的同时，必须在“准时制”（just-in-time，成本较低但缺乏韧性）和“备用制”（just-in-case，其韧性较强但成本较高）两种方法之间取得平衡。走回头路似乎是欠考虑的；在韧性方面犯太多错误，可能会降低经济引擎的能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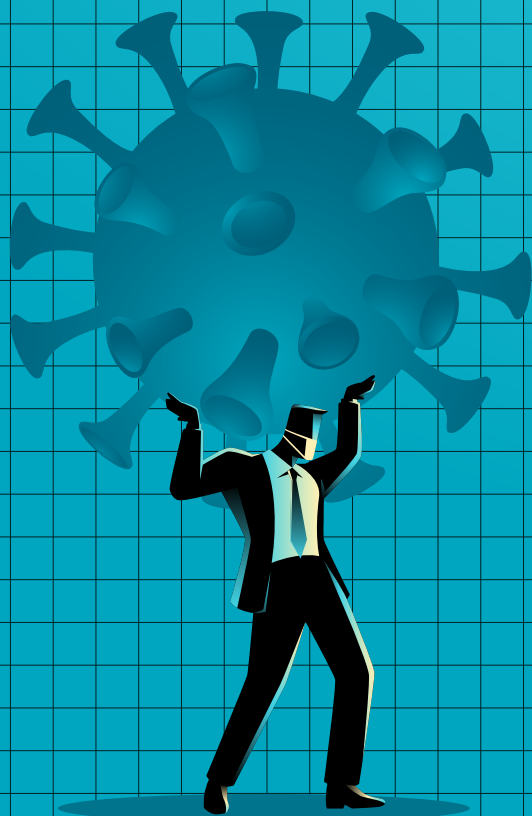
当存在如此之多的不确定性时，在风险和韧性之间找到这种新的平衡，将是我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面临的挑战。这需要努力、耐心和创新思维。从根本上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全球合作。只有当每一个人都安全了，所有人才会安全。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克服巨大的不确定性，以及由这种微观层面上的灾难所造成的经济动荡。FD

杰弗里·冈本（GEOFFREY OKAMOTO）是 IMF 第一副总裁。

债务的 新冠疫情

需要采取新的措施来解决主权债务问题

杰里米·布洛、卡门·莱因哈特、肯尼斯·罗格夫、克里斯托弗·特雷贝施



新冠疫情导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陷入债务困境。对有些国家来说，危机已迫在眉睫；对更多国家和经济体来说，只有超低的全球利率才可能推迟清算。违约率在上升，债务重组的需求也在增加。然而，除非政府和多边贷款机构提供更好的工具来应对这波重组浪潮，否则新的挑战可能会阻碍债务问题的解决。

新冠疫情期间，由于政府收入随着经济活动一起严重收缩，民间资本流动也突然停止，IMF、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机构迅速采取行动，为各国提供急需的资金（见图1）。除了来自多边机构的新增贷款外，二十国集团债权人还批准了对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债务延期偿付。他们还鼓励私人借贷机构效仿此举，不过收效甚微。

到目前为止，新冠疫情的冲击仅限于一些最贫穷的国家，并未演变成全面的中等收入新兴经济体的债务危机。部分得益于发达经济体央行的大规模支持，全球流动性状况依然良好，民间资本外流的情况有所缓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得以继续在全球资本市场举债。根据IMF的数据，新兴市场政府在2020年前6个月发行了1240亿美元的硬通货债务，其中三分之二的借贷来自第二季度。

然而，人们仍有理由担心新兴市场能否持续进入资本市场融资。最危险的时期可能还在后面。第一波疫情尚未结束。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的经验表明，可能会出现更为严重的第二波疫情，特别是如果有效疫苗要到2021年年中（或更晚）才能广泛投入使用的话。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国际出行也仍将面临困境，消费者和企

业之间的不确定性可能仍然很高。世界贫困率已急剧上升，危机过后，许多人将无法重返工作岗位。这场危机对发达经济体的政治影响也尚未全部显现。在疫情前，反对全球化的呼声就已经有所抬头，在这之后可能会愈发高涨。

尽管许多新兴市场政府成功地借入了更多本币，但企业仍在继续累积外币债务。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新兴市场政府很可能会屈服于压力，救助本国的龙头企业摆脱困境，就像美国和欧洲所做的那样。

除了私人资金大幅减少之外，在其他国家工作的新兴市场公民的汇款今年预计将下降20%以上。与此同时，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着和发达经济体同样的预算压力，借贷需求飙升。政府一方面必须加强卫生系统，另一方面必须向生活受影响最严重的人们提供帮助。而随着经济损失的加剧，借贷需求只会进一步上升。

伴随着预算压力的不断上升，出现了新一波主权债务评级下调，且超过了以往危机期间的峰值水平（见图2）。即使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已经放松信贷条件，这种情况也仍在持续。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央行购买企业债券以支持本土企业的行为，也会有损他们的债务评级。

历史表明，即使在违约风险很高的情况下，一些国家仍能继续举债，这并不罕见。回顾1827—2003年的89次违约事件，可以发现一种十分典型的情况，即政府借贷在违约前夕急剧增加，包括国内和国外的借贷（Reinhart and Rogoff 2009）。理想情况下，这次会有所不同，

但历史记录却无法让人乐观。

在众多国家同步出现大规模融资需求的背景下，债务重组的需求日益增长，其数量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债务危机以来从未有过的。官方债权人应做好必要的准备。

在这方面，它们将受到独立于新冠疫情危机之外发展的两种趋势的影响。这里不妨称之为“先存情况”。

第一种“先存情况”是，私人债权人越来越多地要求在债务重组中获得巨额偿还。尽管从理论上讲，相对于私人部门，官方部门是优先债权人，但历史经验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20 世纪 80 年代新兴市场债务危机期间，私人债权人相当成功地撤出了资金，而官方债权人则越陷越深 (Bulow, Rogoff, and Bevilacqua 1992)。欧债危机期间也曾出现类似的情况，投资者当时在希腊确实遭受了一些损失，但在那之前他们的大部分资金便早已撤出，这得益于欧元区政府提供的大规模贷款 (Zettelmeyer, Trebesch, and Gulati 2013)。这种模式在过去两个世纪的私人 and 官方贷款中曾反复出现：当私人投资者后撤时，官方贷款机构

往往会介入 (Horn, Reinhart, and Trebesch 2020, 见图 1)。

最近的一项分析比较了官方债权人和私人债权人的损失 (债务减记)，让人们对所谓官方部门贷款享有高优先级这一说法有了更多质疑 (Schlegl, Trebesch, and Wright 2019)。

这些结果不应该令人惊讶。毕竟，政府有保护向国外放贷的国内债权人的历史 (想想希腊债务危机中那些来自北欧的银行吧)，同时它们也关心借款国的稳定和社会保障情况。这种利他主义反过来削弱了官方部门的谈判地位——尤其是相对于私人债权人而言。因此，官方债权人最后可能成了为大部分损失接盘的一方，即使开始时他们只有很少的未偿还债务，希腊的情况就是如此。

另一个挑战来自私人投资者为抵制大规模债务减记和债务重组而采取的新的抵制行动和诉讼策略。债务重组的数量减少了，但涉及诉讼的比例越来越高 (见引用自 Schumacher, Trebesch, and Enderlein 2018 的图 3)。虽然这可能无法完全解释私人部门在债务重组中所占份额最高这一事实，但其本身却会令人不安。

第二个“先存情况”是债务危机持续的时间长度。正如前花旗银行董事长威廉·罗兹 (William Rhodes)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债务危机期间所说的那句名言：“陷入延期偿还债务很容易，但走出去很难。”

违约事件平均需要 7 年的时间才能解决，而且通常需要多次重组 (见图 4)。不幸的是，债务重组可能会变成一场讨价还价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债务国往往 (理所当然地) 愿意接受当前的少量还款，哪怕这意味着未来债务会变得更高，而且他们完全能够接受在必要时再次进行债务重组。延期偿付也有助于双方从官方债权人那里争取更大的注资 (Bulow and Rogoff 1989)。债权人可能愿意经常对债务进行展期 (“使其长青”)，以暂时改善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在最坏的情况下，新冠疫情危机可能会导致又一个“失去的十年”正在浮现，其中将伴随着债务的长期拖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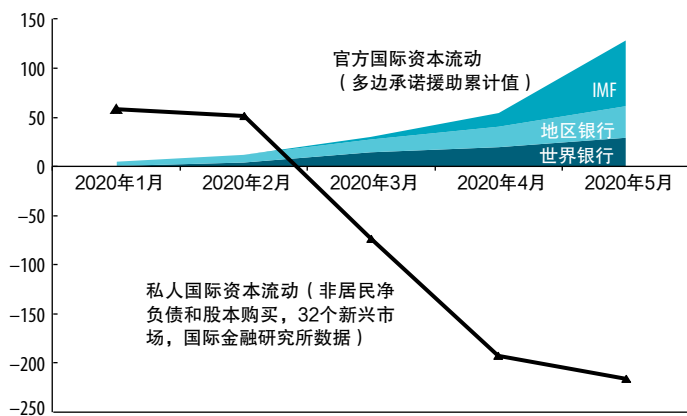
各国政府和多边贷款机构能做些什么，来确

图 1

多边贷款保障

多边机构的快速融资帮助抵消了政府收入锐减和私人资本撤出造成的资金紧张问题。

(十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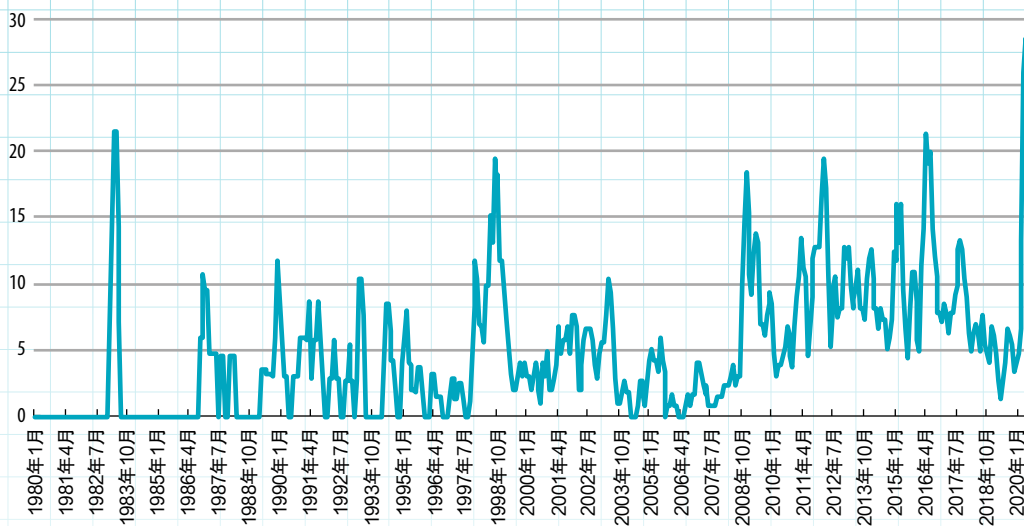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Horn, Sebastian, Carmen M. Reinhart, and Christian Trebesch, "Coping with Disasters: Two Centuries of International Official Lending," NBER Working Paper 27343, June 2020.

图2

主权债务评级下调

2020年评级下调激增，超过了此前危机的峰值。

(1980—2020年主权信用评级下调比例3个月的总和)



资料来源：惠誉国际、穆迪公司、标准普尔和全球经济指标。

保新的融资最终惠及受疫情影响的债务国的人民，而不是只肥了债权人的钱包？他们怎样才能让债务重组更加方便？这里有三个实用的建议：

- 提高债务数据和债务合同的透明度

世界银行、IMF 和二十国集团应继续坚持提高债务统计的透明度，这一点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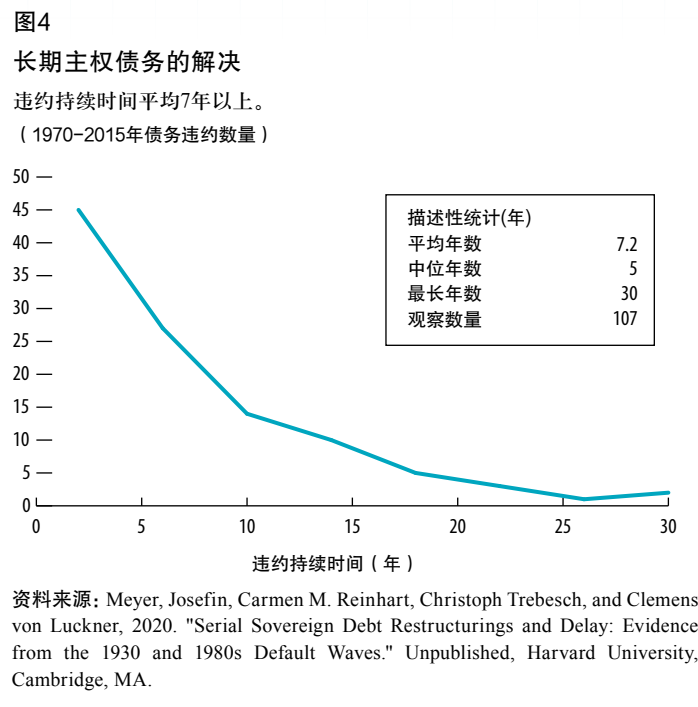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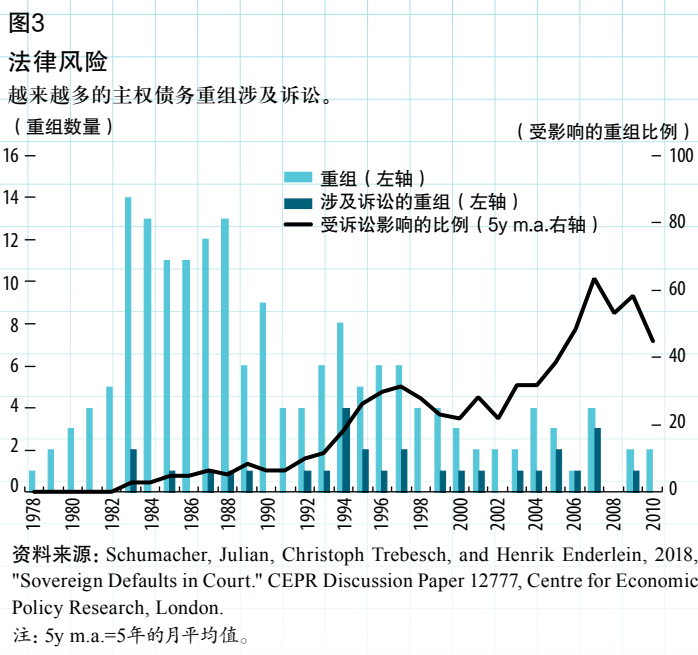
在评估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债时，一个新的、重大的复杂因素涉及中国。更详细的关于私人部门债权人风险敞口的数据可能有助于在陷入债务困境时推动债权人与债务人谈判，并有助于债权人和政府确定哪些债券面临着拒绝偿付或诉讼的风险。例如，一项内容详尽的透明度举措将包括对主权债券所有权信息的全面披露，以及可快速改变债权人构成的信用违约互换合约。如果对所涉及的参与者和欠款数额有充分了解，则将有助于使国际社会和受影响国家的人民更好地监测危机时期稀缺资源的使用情况。国家自身的账目必须变得更加全面，国内债务和国有企业所欠债务的数据必须得到改善。养老金负担的核算也越来越重要，底特律和波多黎各最近的债务解决方式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 应充分考虑下行风险，进行实事求是的经济预测

对增长进行实事求是的预测对避免低估一个国家的短期融资需求或高估其偿债能力而言极为关键。IMF 历史学家詹姆斯·鲍顿 (James Boughton) 指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债务危机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对增长预期持续保持过度乐观，尤其是在拉丁美洲。而实事求是的预测，尤其是如果能充分认识到高负债国家的脆弱性，则有助于危机的加速解决。及早发现破产情况并明确需要进行大规模债务减记的情况虽无法保证更快解决债务问题，但却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

- 应推动新的立法，支持主权债务的有序重组

在管理国际债券的司法管辖区（以纽约和伦敦为主，但不仅限于此两处）或处理支付的司法管辖区采取法律措施，可以为主权债务人和债权人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从而有助于更有序的重组。例如，国家立法可以限制以大幅折扣购买的违约政府债券的回收额度。2010 年，英国便为参与“重债穷国”债务减免倡议的国家制定了这样



一项法律，而比利时在2015年通过了所谓的“反秃鹫基金法”，以防止诉讼债权人扰乱通过欧洲结算系统(Euroclear)支付的款项。这种方式还可以推动立法以促进多数重组，使主权国和符合条件的多数债权人达成一项对所有接受重组的债权人都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全球新冠疫情造成的冲击堪称百年一遇，其冲击之大，需要官方和私人债权人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做出慷慨回应，包括维护全球贸易体系和帮助各国应对债务问题。

无论何种措施，但凡其有助于改善债务问题，我们都必须提供支持。但是，为了确保尽可能多的援助惠及债务国民众，必须确保债权人之间的公平权益以及公平分担责任，特别是在官方和私人债权人之间。我们衷心希望，官方援助和软贷款能够尽可能多地用于帮助世界各地的贫困人民，同时尽可能少地用于支付那些不具妥协精神的债权人的债务。FD

杰里米·布洛(JEREMY BULOW)是斯坦福商学院 Richard A. Stepp 经济学教授;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M. REINHART)是世界银行集团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是哈佛大学 Thomas D. Cabot 公共政策教授和经济学教授;克里斯托弗·特雷伯施(CHRISTOPH TREBESCH)是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金融学教授。

参考文献：

Bulow, Jeremy, and Kenneth Rogoff. 1989. "A Constant Recontracting Model of Sovereign Deb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 (February): 155-78.

———, and Afonso Bevilacqua. 1992. "Official Creditor Seniority and Burden Sharing in the Former Soviet Bloc."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195-222.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Reinhart, Carmen M., and Kenneth Rogoff. 2009. *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chlegl, Matthias, Christoph Trebesch, and Mark L. J. Wright. 2019. "The Seniority Structure of Sovereign Debt." NBER Working Paper 2579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Zettelmeyer, Jeromin, Christoph Trebesch, and Mitu Gulati. 2013. "The Greek Debt Restructuring: An Autopsy." *Economic Policy* 28 (75), 513-63.

征服不平等的鸿沟

新冠疫情暴露出巨大的不平等问题，但现在行动还为时不晚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照片：DANIEL BAUD AND SYDNEY OPERA HOUSE

世界各国对这场疫情的管控和应对方式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是从各国在维护其民众健康、维持经济运行上的成效看，还是从其各国的不平等程度来看，都是如此。造成这些差异的因素有很多：现有的卫生保健状况和医疗资源不平等；国家对疫情的准备程度和经济的韧性；公共部门反应措施的质量，包括对科学和专业知识的依赖程度；公民对政府指导的信任度；公民如何在追求个人“自由”和尊重他人之间实现平衡，包括能否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产生外部效应，等等。至于上述各种因素其强度分别如何，研究人员需要花费数年时间才能剖析清楚。

我们需要全面改写经济规则。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两个国家一窥其中的经验教训。如果美国代表一个极端，也许新西兰可以代表另一个极端。这是一个有能力的政府依靠科学和专业知识来做决策的国家，一个社会团结（公民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影响他人）以及信任（包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很高的国家。新西兰已成功控制住疫情，目前正在使用一些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来重建经济，并使其具有疫情后的世界所应该有的特点：一种更加绿色、更加以知识为基础、更加平等、更加团结同时具有更高层次的信任的经济。这其中有一种自然的动力。这些正面的特性可以相互促进。同样，一些负面的、具有破坏性的因素也会使一个社会不堪重负，导致包容性下降、两极分化加剧。

新冠疫情给不同群体带来的机会并不均等：它的主要目标是那些健康状况不佳者以及日常生活中与他人有更多接触的人。这就意味着，贫困人口受到的伤害更大，尤其是在贫穷国家和一些医疗保健服务得不到保障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美国之所以是感染者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至少在本文付印时是这样），一个原因是，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美国是平均健康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这表现在预期寿命较低（现在甚至比7年前还低）和不同人群健康差距最大这两点上。

不幸的是，尽管新冠疫情之前的不平等已经非常严重，而且这场大流行病尖锐地暴露出我们社会当中的不平等，但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不平等问题在疫情之后的世界可能会更加严重。原因很简单：新冠疫情不会很快消失。人们对另一场大流行病的恐惧将会持续一段时间。现在更有可能的是，无论公共还是私人部门都将认真对待其中的风险。这意味着某些活动、某些商品和服务以及某些生产过程会被认为具有更大的风险和成本。虽然机器人也会感染病毒，但它们更容易管理。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机器人很可能会取代人类，至少在在边际上是这样。远程办公将至少在边际上取代航空旅行。新冠疫情将加剧机器人对某些工作的威胁，这包括从自动化属性较高的工作到低技能的、人与人之间的服务岗位（例如，教育和卫生领域的某些服务人员），而此前的观点一般认为这些人员受到的影响较小。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对某些类型劳动力的需求将会减少。这种转变几乎肯定会加剧不平等，或者，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会加速推进当前业已存在的一些趋势。

新的经济，新的规则

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在就业市场变化的同时，加快提升劳动者的技能，为其提供培训。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仅靠这些措施是不够的。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全面的计划来减少收入不平等。该计划首先需要认识到，一个多世纪以来主导经济学家思维的竞争均衡模型（即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价格由竞争市场决定，而竞争市场的本质是需求和供给）并不能很好地描述今天的经济，尤其是在理解不平等现象加剧上，甚至是理解创新驱动型增长方面，它的表现都欠佳。我们的经济充斥着市场力量和剥削。游戏规则很重要。公司权力的限制措施遭到削弱，工人的议价能力被压至最低，保护消费者、借贷者、学生和工人免遭剥削的监管规则遭到侵蚀，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经济表现变差，主要特征是寻

租现象日益严重，不平等现象加剧。

我们需要全面改写经济规则。例如，我们的货币政策需要更多关注确保所有群体的充分就业，而不仅仅是关注通货膨胀；我们需要更加平衡的破产法，以之取代那些对债权人过于友好、对从事掠夺性贷款的银行家追责过轻的旧破产法；与公司治理有关的法律需要认识到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十分重要，而不仅仅只有股东才重要。与全球化有关的规则不仅仅服务于企业利益；劳动者和环境必须得到保护；劳动法需要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并为集体行动提供更大的空间。

但即使所有这些都实现，也无法创造出我们所需要的平等和团结，至少在短期内如此。我们不仅要改善以市场为基准的收入分配，还要改善收入的再分配方式。比较反常的是，一些市场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比如美国，实际上实行的是累退税制度，即相对于社会中下层劳动者，高收入者缴纳的税收在其收入中的占比更低。

在过去的十年中，IMF已经认识到平等对于提高经济表现（包括增长和稳定）的重要性。市场本身并不关注分散型决策所产生的更广泛的影响，而正是这种决策导致了以外币计价的过度借贷或过度不平等。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没有人关注到政策（比如资本和金融市场自由化）如何加剧了市场波动性和社会不平等，也没有人关注其他政策变化（比如从固定收益制到固定缴款制退休/养老金计划的转变，或从公共养老金到私人养老金的转变）是如何弱化了经济的自动稳定器，从而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造成了更严重的宏观经济波动。这些规则正在影响各经济体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方式，而且涉及其中的许多方面。在一些国家，这些规则鼓励短视行为，加剧了不平等；所有未能出色应对此次疫情的国家都表现出了这两种特征。这些国家对新冠疫情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他们的全球供应链韧性不足。例如，当疫情暴发时，美国公司甚至无法向公众提供足够的口罩和手套等简单消耗品，更不用说病毒检测试剂和呼吸机等更复杂的产品了。

新冠疫情不仅揭示出各国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事件本身可能还会导致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

国际层面

新冠疫情暴露并加剧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国际层面，它同样暴露并加剧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最不发达经济体的卫生条件较差，卫生系统对新冠疫情的准备不足，人们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更容易受到传染，而且他们也不像发达经济体那样拥有充足的资源去应对疫情的经济后果。

只有在所有地方都得到控制之后，疫情才能得到根本控制；同样，只有在全球经济出现强劲复苏之后，经济低迷才能得到遏制。这就是为什么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提供所需的援助既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也涉及对自身利益的考量。没有这种援助，全球新冠疫情将持续更长的时间，全球不平等将加剧，国际社会将出现分化。

虽然二十国集团宣布将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向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提供抗疫援助，但迄今为止它们做的还不够。特别是，2009年曾使用的一种易于获取的工具尚未被使用：发行50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SDR）。美国或印度对此始终缺乏热情，这一点目前尚无法解决。特别提款权对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将有巨大的帮助，而发达经济体的纳税人也不需要或只需要付出很少的代价。如果这些经济体将其特别提款权捐给一个信托基金，供发展中经济体用于应对新冠疫情的各种紧急情况，那将是更为可取的。

同样，游戏规则不仅影响国家内部的经济表现和不平等，在国家之间也同样如此；在这个领域，全球化的相关规则和规范居于核心地位。有些国

家似乎在追求“疫苗民族主义”；而另外一些国家，如哥斯达黎加，正在尽其所能确保所有与应对新冠疫情有关的知识都能在世界范围内共享，就像流感疫苗每年的更新一样。

新冠疫情可能引发一连串的债务危机。鉴于这场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规模之大，当前的多种因素，包括低利率、发达经济体金融市场鼓励贷款以及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肆意借贷，已导致一些国家的债务超出其偿还能力。国际债权人，尤其是私人债权人，现在应该懂得这样一点：人无法从石头里挤出水来。债务重组是必然的，唯一的问题是，它将是有序的还是无序的。

新冠疫情不仅揭示出世界各国之间的巨大差异，而且这一事件本身可能还会导致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并留下持久的伤疤，除非全球各国和各国国内更加团结。以IMF为代表的国际机构以身作则，发挥了全球领导作用。部分国家内部也有着优秀的领导者，他们遏制了疫情，成功应对了其经济影响，防止其导致新的不平等。但是，正如某些国家的成功引人注目一样，另一些国家的失败也同样引人注目。可以说，那些疫情应对不力的政府拖了全世界的后腿。不同应对方式产生不同的结果，而随着局面的逐渐清晰，希望情况会有所转变。新冠疫情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其经济影响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现在改变路线还为时不晚。FD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培养

全球金融合作



当前的危机凸显了加强全球金融架构的紧迫性

巴里·艾肯格林

新冠疫情是对全球经济的一次终极压力测试，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更是如此。早期，人们期望着这种病毒可能会绕过低收入国家，因为它们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空中交通联系较少，人们也曾期望，在那些过去有过疫情的国家，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种病毒能够被控制住。但这些期望都落空了。我们现在知道，这种病毒威胁着全球每一个角落。此外，即使在那些能够避免深度卫生危机的国家，其所遭受的金融影响也十分严重。

在新冠疫情实际进入发展中国家之前，金融冲击便已经发生了。2020年2月至4月，超过1000亿美元的金融资本从新兴市场 and 前沿市场流出，其规模是全球金融危机前3个月的5倍。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海外侨汇将再减少1000亿美元，是此前危机期间的4倍。今年的全球贸易预计将比2009年下降得更快。全球经济衰退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货币兑美元汇率出现下跌。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击。作为应对，各国政府出台各种紧急支出计划，为家庭和企业提供援助。新兴市场央行纷纷降息，有些甚至购进证券。在各种措施的保障下，疫情冲击给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的负面影响最终比预期的小了一些。

对新兴市场而言，这种政策响应是前所未有的。这和它们在此前危机中被迫采取的行动正好相反。这种反差表明，新兴市场在积累财政空间和抗击通胀的信誉方面取得了进步。这些新兴市场央行所采取的行动就是一个迹象——它们采用了正式的通胀目标制，将其作为一种增强信誉的手段。在2020年的前5个月，这些央行比那些没有设定通胀目标的央行能多降息40—50个基点。

这并不是否认融资压力的存在。但是，一些人曾预测的债务违约、汇率暴跌以及金融体系崩

溃的浪潮并没有成为现实。至少目前还没有。

美元的主导地位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避免了最坏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避免了困境。新冠疫情的金融影响凸显出全球金融架构仍存在缺陷，也强调了纠正这些缺陷的必要性。

首先，这场疫情提醒了我们，全球经济（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流动性方面是多么依赖于美元。在国际银行间市场上，银行拆借需要大量使用美元。全球85%的外汇交易都使用美元。美元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贸易计价和结算工具。出售给外国投资者的债券也绝大部分以美元计价。

当银行惜贷时，各国可以通过持有美元储备来避免流动性突然短缺。近几十年来，各国央行和政府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也是由疫情所引发的美元短缺和金融危机没有发展得更严重的原因之一。

但是，之所以没有出现破坏性的美元稀缺现象，一个更重要的解释是美联储采取了非同寻常的行动——它为外国央行提供了美元互换和美国国债回购便利，从而迅速填补了美元缺口。美联储购买了一系列固定收益资产，为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并将信贷息差拉回到危机前的水平。寻求高收益的投资者除了新兴市场以外别无选择，新兴市场的债务是美联储没有购买的少数固定收益资产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度过最初的紧张时期之后资本会回流到新兴市场。

虽然美联储的有力行动防止了全球金融市场失灵，但人们从中也看出国际金融的一个不足之处。美联储只向部分国家提供货币互换，而且其选择标准并不透明。同样不确定的是，在未来的危机中，联邦储备委员会是否还会这么有预见性



并采取同样的行动。

于是有人建议，美联储（或许还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应该将提供货币互换的决定权委托给一个立场公正的仲裁者，比如 IMF。由于各国央行不是 IMF 的成员，这个决定最终需要各国政府来做，而这就会是一个问题了。各国政府，尤其是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政府，不会倾向于将其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控制权拱手让给国际社会。

IMF 和世界银行的作用

提到 IMF，就会指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另一个美元来源：IMF 贷款便利。面对疫情，IMF 迅速采取行动，创设了一种用于提供流动性援助的新便利——短期流动性额度（Short-term Liquidity Line），同时加强了对现有机制的利用，包括一些准许在尚缺少成熟规划的前提下发放贷款的机制。在 2020 年上半年，这一机制收到了 100 多项紧急资金请求。

IMF 的总体贷款能力被限制在 1 万亿美元以内。这个数字可能不足以应对本次疫情产生的全部影响以及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IMF 通过对其多边和双边借贷安排的重新谈判，其中包括“新借贷安排”（New Arrangements to Borrow），避免了资源的缩水。但是，通过增加份额来进一步提升其可用资源规模的相关努力未能见效。此外，尽管官方和学术界发出广泛呼吁，但尚未就新的特别提款权分配问题达成绝大多数国家的必要协议。在份额总检查的背景下开展 IMF 治理改革以及加强特别提款权的国际作用，这将是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新冠疫情危机提醒我们，以上工作尚未完成，而这削弱了全球金融安全网。

作为 IMF 姊妹机构的世界银行可以将新冠疫情债券作为其对应对危机的贡献。2017 年，为了应对在西非暴发的埃博拉疫情，世界银行在多个发达经济体捐助国的财政支持下发行了面向私人投资者的疫情债券，用于为受大规模疫情影响的国家提供紧急金融援助。就当时来看，这一工具

似乎非常适合帮助贫穷国家抵御卫生相关的冲击。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现在看来，这些债券被过度设计了；它们的文件异常复杂，以至于投资者和政府都弄不清它们具体说了些什么。在疫情暴发足足 132 天后，在全球确诊病例达到 200 多万例后，触发付款的严格条件才得到满足。触发付款的变量之一是在国家层级确诊和报告的病例数，而贫穷国家是最没有能力对感染者进行精确检测的。新冠疫情债券和灾难债券不同，后者是当发生涉及一个或数个国家的飓风或地震时进行赔付，而新冠疫情覆盖全球，因此引发了许多同步赔付。结果，这些债券的投资者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投资损失殆尽。

世界银行在 2020 年曾有另一个与疫情相关的计划，但显然发展中经济体和投资者对这一机制已经避之不及，这导致世界银行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建立某种形式的疫情金融保险，这种想法在概念上是合理的，但要想找到令人满意的机制显然并非易事。

债务的处理

最后，在大宗商品价格和全球贸易崩溃的情况下，低收入国家还面临着偿债的挑战。基于这些现实，IMF 于 2020 年 4 月向 29 个曾接受贷款的低收入国家进行债务减免，在先期未来 6 个月内延迟偿还债务。此外，IMF 总裁克里斯塔莉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还呼吁那些向低收入国家提供双边贷款的政府和私人部门债权人允许债务人暂停偿还债务。继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之后，二十国集团发表了一项宣言，即“G20 行动计划”（G20 Action Plan），表达了对这些倡议的支持。

然而，这些倡议还面临着集体行动的问题。对于官方双边债权人来说，如果其他国家的政府未能采取同样的行动，那么其单方面暂停还款行动就没有什么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债务人只能得到有限的救济，而参与该项倡议的政府则将最终为债务埋单。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官方团体一直通过巴黎俱乐部 (Paris Club) 解决这一问题。巴黎俱乐部是一个债权国集团，最初由七国集团成员国政府组成，俱乐部主席是一名法国财政部官员。遗憾的是，中国现在不是二十国集团成员，而中国对贫困国家所持有的涵盖在二十国集团倡议之内的官方双边债务超过了所有其他债权国的总和。中国已同意采用与巴黎俱乐部相同的债务减免条款，但尚不清楚这一承诺是否也适用于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贷款。外界甚至不清楚贫困国家政府总体上欠中国官方部门多少钱。如果中国成为巴黎俱乐部的正式成员，所有这些问题会更容易解决，但可惜它还不是。这是未能更新全球金融架构以适应 21 世纪现实的又一个失败案例。

在私人债务方面，债权人已将制定条款和组织谈判的任务外包给机构投资者协会——国际金融协会 (IIF)。这种做法有点像把狐狸扔进鸡舍里。IIF 警告新兴市场，假如其试图重组债务，未来可能无法再入市融资。IIF 警告称，机构投资者需要对其客户负责，而不是对政府或国际社会负责。阿根廷曾尝试对其政府债券进行重新谈判，但事情最终因不同债券的合同条款相互冲突而搁浅，这反映出债券合同缺少统一的标准。拒不让步的债权人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阻碍了事件的进展。

现有的特设机制没有能力处理大量的债务重组。市场缺乏一个国际机制，甚至没有一个标准的程序来应对债务重组的浪潮，这是显而易见的。

未来的计划


那么，就金融架构而言，我们从新冠疫情危机中学到些什么呢？它提醒我们，韧性始于国内的制度建设和资源布局。拥有财政空间的政府在需要时能够将其派上用场。在通胀预期稳定的国家或地区，央行能够为金融市场和经济提供支持。现在已有数量惊人的新兴市场（以过去危机的标准来看数量惊人）能够实施支持性政策。这种能力反映了它们在建立更稳健的货币、财政

和金融机构方面所取得的成功。

但国际层面的经验就不那么令人振奋了。跨境金融交易仍然以美元为基础。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情况会改变，但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在短期内改变。尽管对美元的需求是全球性的，但其供给仍然只是国家性的：它以美联储的政策为基础。美元也有其他潜在的来源，尤其是 IMF，如果该组织拥有更多的资源，它可以通过现有的规划和贷款机制提供更多获取美元的渠道。另一种可能是重新分配特别提款权。遗憾的是，目前各相关方尚未就如何实施这一改革达成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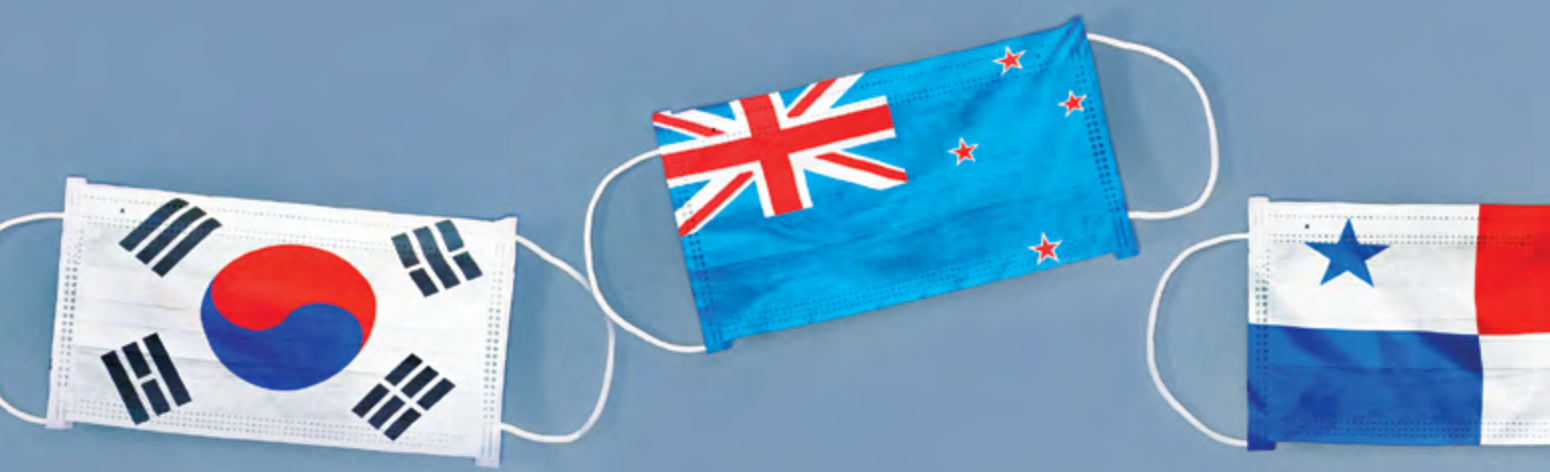
这次危机提醒我们，韧性始于国内的制度建设和资源布局。

尽管新冠疫情债券的表现令人失望，但利用金融工具和市场来防范此类风险的想法是合理的。或许可以简化这类工具的设计并增加捐助者提供的补贴成分，这可以使它们对政府和投资者更具吸引力。问题是，这是否足够？

最后，有必要加强与债务问题处理有关的安排。巴黎俱乐部的结构应该更新，以适应 21 世纪的现实情况。官方机构应该在重组私人债务的谈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它们可以为此类谈判设定标准，也可以鼓励监管机构强制要求机构投资者遵守这些标准。政府和监管机构可以要求在贷款合同中加入相关条款（所谓的“单一集合”条款，single-limb aggregation），鼓励在大流行病或其他全球危机来袭时进行快速重组。它们可以禁止不含此类条款的债券交易。这个策略可能会奏效。如若不然，呼吁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包括为主权国家设立某种国际破产法庭的呼声就会重现。 

巴里·艾肯格林 (BARRY EICHENGREEN) 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George C. Pardee and Helen N. Pardee 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





改革卫生系统

作为各国抵御危机的第一道防线，卫生系统需要予以强化

珍妮薇·费尔南德斯

数百万人感染，数十万人死亡，以及大范围的封锁。在短短6个月里，新冠疫情极大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在调整适应的过程中，我们一点点了解了这种病毒，了解到患者在康复之后肺部、心脏、肾脏和大脑都会受到长期影响，尤其还了解到暂时的防疫成功可能会让人们放松警惕，并在疫情卷土重来时再次将自己暴露于危险之中。

尽管还有很多未知，但新冠疫情至少暴露了几个众所周知且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现象。同时患有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疾病以及糖尿病等疾病的人群在感染后出现并发症的风险更高，而这些风险因素对弱势群体的影响更大。

妇女在照顾病人和儿童方面首当其冲，她们在隔离封锁期间遭受家庭暴力的风险变得更高，而在其他方面，比如女性健康和生育医疗服务因疫情影响而中断，比如非正式部门的失业潮，妇女也都受到较大影响。

新冠疫情还暴露了富国和穷国之间的不平等。多数情况下，富裕国家的卫生系统拥有更

充足的资金支持，而且它们有能力暂时冻结经济，并为经济刺激方案提供数十亿美元。然而，大多数贫穷国家的卫生系统不仅资金不够，人员配备也不足；它们的供水系统和卫生系统较为薄弱，人口众多，债务不断增加，失业率居高不下，用于经济救济的财政能力有限。

更糟糕的是，即使在我们与当前危机作斗争的同时，另一场大流行病又在伺机而动，随时都有暴发的可能。除了迫在眉睫的全球新冠疫情之外，各国还面临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的威胁，此外还有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所有这些都对社区和卫生系统造成毁灭性影响。

在所有这些自然或人为导致的危机中，卫生系统堪称一个国家的第一道防线，而如果该系统韧性不足，它终将因不堪重负而崩溃，不仅会加大健康风险，还会导致不平等加剧。德国、新西兰、韩国、越南以及中国台湾省等国家或地区在控制新冠疫情上表现相对较为出色，它们的卫生系统显示出了韧性。



卫生系统的韧性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教授玛格丽特·克鲁克 (Margaret Kruk) 将卫生系统的韧性定义为“医疗卫生人员、机构和民众针对危机开展预防性准备并有效应对危机的能力；当危机来袭时，能够维持卫生系统的核心功能，而且当情况需要时，能够根据在危机中吸取的教训对卫生系统进行调整” (Kruk and others 2015)。面对危机，一个有韧性的卫生系统能够有效应对冲击并持续提供服务，并且能够在危机结束之后恢复正常运转，从而无论在寻常时期还是特殊时候都能提供有效的卫生保障。

但是，卫生系统不是独立运行的；它依靠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运作，大流行病和其他对弱势群体影响较大的卫生事件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健康影响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在后疫情时代，一个有韧性的卫生系统还必须解决这些脆弱性和不平等问题，并且有能力持续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危机。

根据越来越多的文献和各国在埃博拉以及新冠疫情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概括出一个有韧性的全国性卫生系统的五大特征。

第一，系统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各国必须加强其现有的疾病监测系统，定期收集并分析公共和私人医疗卫生机构的信息，以预防或遏制疫情。目前，卫生领域已经存在几种简单有效的、可以在资源不足的环境中使用的疾病监测系统。例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病毒学家雅各布·约翰 (T. Jacob John) 在印度南部建立了一个新的系统，其特点是使用一套标准化的症状（今天称为“症状监测”）来检测和抑制疾病的暴发 (John and others 1998)。这套全国性监测系统还必须循序渐进地提升其能效，才能被用于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世界范围内定期监测此类事件，这既需要能力建设，也需要外交努力。

第二，系统必须反应灵敏。无论是德国、新西兰、韩国、中国台湾省等国家或地区，还是包括印度喀拉拉邦在内的一些省/州，在所有这些成功控制住疫情的地方，其卫生系统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疫情迅速做出了反应。要想应对及时，卫生系统必须早在疫情暴发之前就做好准备，这可能需要多年的规划和投资。2003 年，在经历

非典疫情后，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省制定了详尽的应对计划，并要求医院每年进行疫情应对演练；在韩国，2015 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结束后，政府对标准操作规程进行了大量投资，并以提供实际奖励的方式鼓励生物医药企业研发快速诊断工具。各国可能都制订了针对疫情的应急准备计划和操作规程，但除此之外还必须配备拥有决策自主权的专职个人和团队，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在疫情发生时迅速做出反应；此外还需要加强卫生基础设施投资，组建专门负责物资供应的团队并建立相关程序，负责在物资出现短缺时进行紧急采购和消耗品补充。

第三，系统必须能做到灵活变通。此次疫情中，多个国家的医院将其他科室或部门的工作人员部署到新冠疫情病房。在 1 月和 2 月，柬埔寨对近 3000 名卫生工作者开展再培训并部署到负责快速检测和追踪密切接触者的岗位上。2020 年 2 月，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搭建起方舱医院，即将体育馆和展览中心等大型场馆改造成临时医院，用以隔离和护理轻度和中度患者，减轻医院负担。在世界各地，很多医院都采取了以虚拟形式提供部分医疗服务做法，比如通过电话和视频提供咨询服务。这些实践显示了卫生系统在灵活利用现有资源（无论是劳动力还是卫生保健设施）以及适应迅速变化的形势等方面的潜力。

第四，所在社区的韧性决定着卫生系统的韧性。在紧急情况期间，地方公共卫生团队必须要求地方领导人和社区志愿者参与到防疫体系中并发挥组织性作用；而在正常时期对相关方的职能进行扩展，则有助于提升各方在参与中的治理。在泰国，100 多万名乡村卫生志愿者参与到社区疫情监测中。在印度喀拉拉邦，政府培训并部署了 30 多万名青年志愿者，他们在封禁期间向当地社区提供社会服务，并为被隔离的家庭提供各种支持 (WHO 2020)。地方领导人和志愿者在其社区中受到信任，地方卫生小组与此类利益相关方合作，可以确保良好的双向沟通，这有利于说服社区居民听从权威卫生机构推荐的防疫措施。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有韧性的卫生系统必须是公平的。无论是富裕国家还是贫穷国家，无论是面对新冠疫情还是其他突发卫生事件，未被医疗保险所覆盖的人群都难以得到检测和及

时治疗。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全民医疗保险，无论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地理位置、性别、年龄或此前的健康状况如何，均不应影响其获得医疗保险（WHO 2010）。各国必须对全民医疗保险加大投资力度，尤其需要通过扩大保险覆盖面和加强初级医疗服务做到这一点，确保及早发现新冠疫情或其他传染性疾病，以便于及时应对。这不仅有助于避免二级和三级卫生设施负担过重，同时也可避免干扰医院其他部门的正常运转。最重要的是，全民医疗保险有助于防止普通家庭在此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陷入贫困。

此外，政府还必须加强三个交叉领域，以确保卫生系统的韧性。第一，迫切需要采取多部门合作的政府管理方式，以此建立和激活相关机制，使卫生政策制定者能够和包括教育、社会福利、金融和贸易以及环境在内的其他相关公共部门同行密切合作。

第二，和私人卫生部门建立伙伴关系。在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私人医疗机构是民众的第一个卫生联络点，提供了社会所需的大部分医疗服务。这部分机构不容忽视。必须通过公共管理以可持续的方式使其参与到整个卫生系统中。

第三，需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清晰、一致、透明和及时的沟通，包括向内部（公共部门）和外部（公众）受众提供权威可信的信息。沟通渠道必须将能获取反馈意见并予以充分吸纳。良好的沟通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鼓励人们遵守必要的行为，以阻断病毒的传播并控制疫情。

推动与实现

要想在医疗体系韧性的各方面交叉领域中确保实现上述特征，就必须拥有资金保障。各国政府必须通过预算再分配、税收改革和管理、奢侈品税和烟酒税等机制，以及与私人部门及慈善部门的合作，增加公共卫生系统的国内财政资源。2013年，在对酒精和烟草征税的一年内，菲律宾创造了12亿美元的收入，足以为4500万居民提供全民医保。

政府还可以通过提高卫生支出的利用效率来改善资金使用情况。这可以通过以下策略来实现：改革激励和支付结构以解决医疗服务的过度使用问题，将药品利润控制在合理水平并推广仿

制药，集中采购药品以及解决腐败问题等。

遭受经济冲击的贫穷国家在筹集卫生资金时会遇到很多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迫切需要对全球应对措施进行统筹管理。富裕国家、捐助方和多边机构必须加强开发性援助。世界银行和IMF等机构已采取初步措施，包括增加紧急融资、减免债务和支持债务国暂缓偿债等。除了无条件紧急资金援助以外，未来的支持行动还应包括提高卫生系统的综合能力和韧性建设的相关计划，并为最弱势群体的社会性支出和社保体系提供保障。

应对新冠疫情和未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韧性的卫生系统是重中之重，而良好治理又是其中的关键所在。有效的治理要求所有政党和组织机构的领导者做到尽职尽责，需要建立有效的问责制并保证机构运作充分透明，此外还需要针对各级公共卫生官员出台决策自主权机制和激励机制。

在新冠疫情的疗法和疫苗研发方面，全球合作的第一步必须是各方应共同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尽管其自身存在缺陷，但今天没有任何其他国际机构拥有世卫组织所具备的技术实力、规范能力和号召力，只有世卫组织能够将各国凝聚在一起，确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全球公共产品的公平分配。正如2020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所表明的，在美国宣布退出世卫组织、可用资金面临威胁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与合作（Sridhar and King 2020）。

正如利比亚前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所说：“任何地方存在新冠病毒都对全球人民构成威胁。”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够独自彻底解决疫情危机；这需要全球的合作和团结。FD

珍妮薇·费尔南德斯（GENEVIE FERNANDES）是爱丁堡大学全球健康治理和呼吸健康研究员。

参考文献：

- John, T. J., R. Samuel, V. Balraj, and R. John. 1998. "Disease Surveillance at District Level: A Model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Lancet* 352 (9121): 58–61.
- Kruk, M. E., M. Myers, S. T. Varpilah, and B. T. Dahn. 2015. "What Is a Resilient Health System? Lessons from Ebola." *Lancet* 385 (9980): 1910–12.
- Sridhar, D., and L. King. 2020. "US Decision to Pull out of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BMJ* 370:m2943.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0. "Health Systems Financing: The Path to Universal Coverage." Geneva.
- . 2020. "Responding to COVID-19—Learnings from Kerala." Geneva.

投资绿色复苏

新冠疫情只是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的一个前奏

乌尔里希·沃尔茨

这场危机是一场破裂，一个极度混乱的时刻。与欧美各国感受最直接的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相比，新冠疫情更加严重，它几乎影响到了全人类。在各国，无论发达还是欠发达国家，新冠疫情危机不仅暴露了卫生和社会体系的脆弱性，也暴露出我们经济的脆弱性。它还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凸显出加强防灾准备的必要性。危机结束之后，当我们重建经济和社会时，增强韧性需要成为重建的主要指导原则之一。我们需要确保有更充分的准备来抵御未来的大流行病，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努力应对人类的另一个重大威胁——气候变化。

长期以来，科学家们始终提醒人类暴发疫情的风险，曾发出大量警告，但世界对这场危机却毫无准备。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

也是一样准备不足。和大流行的情况一样，科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气候危机敲响警钟。气候变化已经发生，而且在不断加速，这一点毫无疑问。最近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生的野火，北极永久冻土的融化，以及风暴、洪水、干旱和其他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在数量和强度上的增加，都指向一个已经出现的问题。地球将很快超过气候临界点，并将为生命带来不可逆转的真正威胁。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的说法，在新冠疫情袭击我们之时，我们还有大约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低碳转型，并将世界经济带向将全球变暖控制在比工业化之前的水平高1.5摄氏度的轨道。未来几年将是我们避免灾难



性全球变暖的最后机会。我们必须将各种危机应对措施转化为变革性的政策响应。各种旨在保护就业和促进经济复苏的短期危机应对措施需要与旨在减缓气候变化和增强气候变化适应力及韧性的长期战略目标结合起来。我们需要尽可能利用经济刺激和复苏措施来增强我们的韧性，并实现合理转型。正如 IMF 总裁克里斯塔莉娜·格奥尔基耶娃所言，现在到了“要么恢复，要么失去”《巴黎协定》的时候。

推动可持续投资

在可持续复苏和经济进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权衡与取舍。许多绿色技术已经成熟，在大多数情况下，低碳能源已经比化石燃料能源更便宜。最近的证据表明，与传统的财政刺激相比，经过

合理设计的绿色项目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为每一美元的支出带来更高的短期回报。此外，当前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投资已经产生长期且可观的回报，并已实现成本节约，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无作为或行动迟缓则会付出很高的代价。我们现在采取的旨在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代表着一种投资，它将在未来产生收益，而若继续不作为，则将导致灾难性的全球变暖，届时人类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同样，如果未能进行相关投资，增强经济和社会的抗气候变化能力，则会损害我们未来的增长潜力和福祉。根据全球气候适应委员会的计算，在气候适应能力建设上每投入1美元，就可以带来2—10美元的净经济效益。

但是，一个主要问题是：许多国家缺乏实现经济复苏所需的资金和资源，也无力提供所需的

新冠疫情表明，一场自然灾害可以多么迅速地使我们的经济陷入崩溃。

投资去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危机极大地恶化了公共财政，而许多国家的财政状况在当前的危机暴发之前便已经岌岌可危。IMF 预计，今年全球公共债务将增长至全球 GDP 的 100% 以上，同比增长 19 个百分点。放眼今后，许多国家将需要债务减免，以有效应对当前疫情危机，并对其经济进行有意义的投资以应对气候变化。目前，国际金融架构仍缺乏一个适当的体系来应对主权债务不可持续的情况。必须找到合适的方法系统地解决发展中经济体即将到来的债务危机。

此外，在公共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各国有必要对各项公共支出以及税收体系进行调整，以使其符合减缓气候变化的相关要求，这一点至关重要。这其中应包括逐步取消所有化石燃料补贴。根据 IMF 的估计，2017 年全球化石燃料补贴为 5.2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 6.5%。取消这些补贴不仅可以节省大量公共开支，也将有助于减少排放。此外，如 IMF 2019 年 10 月的《财政监测报告》所示，有实质意义的碳税（IMF 建议每吨二氧化碳征收 75 美元）可以成为一种十分有力的环境工具，能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产生许多额外的环境收益，包括降低因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率。各国可以将碳税收入进行重新分配，以支持低收入家庭或社区；由于向低碳经济转型或由于气候变化产生的实际影响，这类家庭或社区受到的冲击将尤为严重。目前相对较低的油价水平为各国政府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使其可以在政治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征收或增加碳税。

调整金融措施

除财政政策之外，还必须按照《巴黎协定》第 2.1c 条的规定，将资金流动与旨在实现低温室气体排放和抵御气候变化发展的途径相结合。为此，货币和金融主管部门需要将气候风险充分纳入其审慎和货币框架。在过去几年里，越来越多

国家的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认识到，气候变化无论对单个金融机构还是系统性金融稳定均构成重大风险。2017 年 12 月，8 家央行和监管机构组建成立了“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如今，该组织已发展至 66 家央行和监管机构。在其发布的一些报告中，NGFS 着重强调了气候变化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当务之急是，货币和金融主管部门应迅速采取行动，落实与应对气候风险有关的综合性框架。这类框架应强制要求向整个金融部门披露气候风险和其他可持续性风险，以帮助从业者更好地进行风险分析；应要求金融机构定期进行气候压力测试，其中须考虑多种过渡情景；此外还应将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纳入审慎监管。

重要的是，各国央行和监管机构也应当调整当前的危机应对措施，以避免在实现金融稳定的同时陷入高碳型经济复苏（Dikau, Robins, and Volz 2020）。那些旨在增强流动性的刺激措施如果不符合《巴黎协定》的原则，可能会极大地加剧金融机构投资组合和整个金融体系中与气候相关的风险的积累。此外，在不考虑气候风险的情况下放松反周期工具和其他审慎工具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此类风险。因此，不应推迟实施各种涉及气候风险的审慎工具，而应加快其实施进度，以尽量减少投资组合中额外风险的潜在积累。

支持脆弱国家

许多国际金融机构已成为 NGFS 的观察员，并积极帮助成员国调整金融体系以使其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它们在这个框架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包括支持成员国的能力建设，在很多问题上它们以身作则，比如带头将气候风险纳入其自身的各项政策，并在制定相关最佳实践方面发挥模范作用。对多边开发银行来说，这还意味着需要根据《巴黎协定》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并彻

底淘汰所有的高碳贷款和投资。在目前的危机形势下，多边开发银行和各国国家开发银行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逆周期贷款，这既能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复苏和就业，同时也可以促进向更可持续的低碳经济转型。

国际金融机构也应加大对那些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的支力度。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是，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最不当为人类工农业活动造成的全球变暖承担责任的。对这些国家来说，迅速加大相关投资以提高自身对气候的适应能力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不幸的是，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经济体在财政方面面临最多困难，无力为适应气候变化和增强韧性提供充足的资金。这些经济体尤其容易受到与气候相关的金融风险的影响，其政府和企业都已经面临着资本成本的气候风险溢价 (Kling and others 2020; Beirne, Renzhi, Volz 2020)。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切实危险是，它们将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即国家越易受气候影响，其债务成本越高，对气候适应能力进行投资的财政空间也越小。

这些国家的金融风险目前已经很高，而随着金融市场对气候风险的定价越来越高以及全球变暖加速，这一风险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 (Buhr and others 2018)。迫切需要国际社会为它们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并建设金融风险转移机制，以尽可能帮助这些国家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加大抗风险能力融资既有助于改善其脆弱性也可降低其债务成本，从而为这些国家提供额外的空间来扩大投资规模以应对气候挑战。

IMF 和多边开发银行也需要开发新的工具，包括拓展应急便利安排，以便在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经济体遭受灾害时为其提供支持。在过去的 20 年里，大约有 20 个国家 (其中大多数是小岛屿国家) 遭受了超过其 GDP 10% 的损失。最极端的例子是多米尼加，2017 年飓风玛丽亚给该国造成的损失估计相当于其 GDP 的 260%。2004 年，飓风伊凡给格林纳达带来约等于其 GDP 150% 的损失。但是，即使在不那么极端的

情况下，灾难也可能对公共财政造成严重破坏，并使主权债务变得不可持续。我们迫切需要讨论如何处理气候债务，也就是说，由气候灾害或必要的适应性措施直接导致的公共债务。

避免永久危机模式

新冠疫情表明，一场自然灾害可以多么迅速地使我们的经济陷入崩溃。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面临这种风险。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共同行动，加强投资力度以缓解并适应气候变化，那么更多的国家将处于永久性危机模式。届时，为数不多的受影响较小的国家也将无法保护自己免受其他国家问题的影响。正如新冠疫情已跨国传播一样，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将波及全世界，尤其是在灾害和气候变化背景下，全球移民的人数也将增加。

气候变化事关重大。我们有 10 年的时间来改造全球经济，避免灾难性的全球变暖。我们需要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个层面以及所有部门 (公共和私人) 做出集体努力，以应对气候变化，并让我们的社会和经济拥有更强大的韧性。我们面临的挑战十分巨大，但这场危机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正如 IMF 总裁克里斯塔莉娜·格奥尔基耶娃所言，我们有责任“选择我们想要的复苏方式”。我们最好作出明智的选择。FD

乌尔里希·沃尔茨 (ULRICH VOLZ) 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可持续金融中心主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学讲师、德国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参考文献：

Beirne, J., N. Renzhi, and U. Volz. 2020. "Feeling the Heat: Climate Risks and the Cost of Sovereign Borrowing." ADBI Working Paper 1160,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Tokyo.

Buhr, B., U. Volz, C. Donovan, G. Kling, Y. Lo, V. Murinde, and N. Pullin. 2018. *Climate Change and the Cost of Capital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UN Environment,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and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Dikau, S., N. Robins, and U. Volz. 2020. "A Toolbox for Sustainable Crisis Response Measures for Central Banks and Supervisors." 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AS Centre for Sustainable Finance,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Kling, G., U. Volz, V. Murinde, and S. Ayas. 2020. "The Impact of Climate Vulnerability on Firms' Cost of Capital and Access to Finance." *World Development*, forthcoming.



种族主义 给我们所

STOP RACISM

JUSTICE IS NOT A CRIME

THE FUTURE IS



有人造成的代价

解决系统性种族主义是一项道德使命；同时它也可以让经济更强大

约瑟夫·洛萨维奥

乔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布伦娜·泰勒 (Breonna Taylor)、艾哈迈德·阿贝里 (Ahmaud Arbery)，三名美国黑人无故被杀，这提醒世界，系统性种族主义在美国仍然非常真实地存在着。这些死亡事件在初夏时节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代表了人们对美国自建国以来便一直困扰其社会的种族主义的更深的愤怒和绝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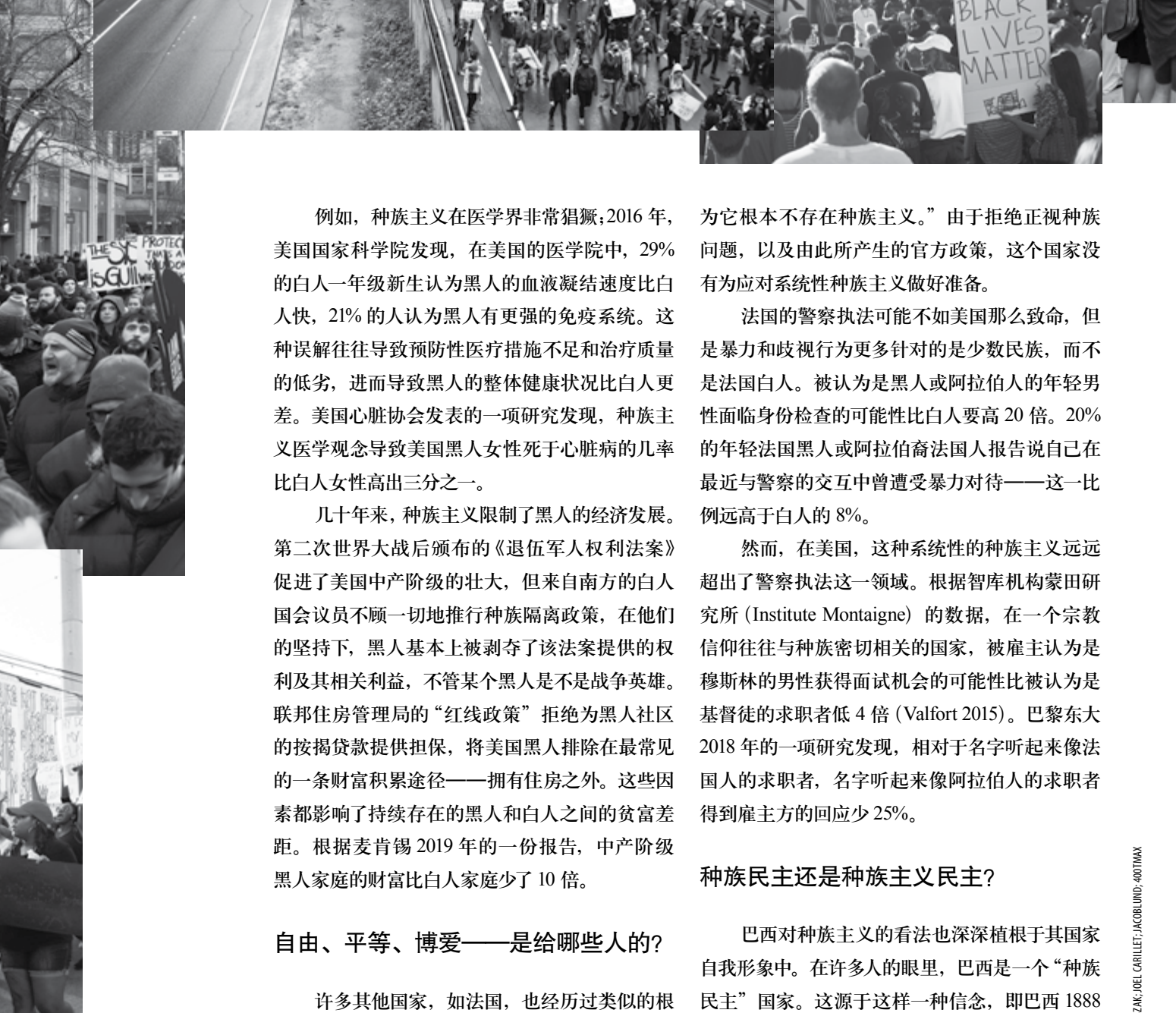
随着抗议活动在世界范围内蔓延，许多人开始将注意力从对美国黑人的声援转移到自己国家的种族不公正上。阿达马·特拉奥雷 (Adama Traoré)、若昂·佩德罗·马托斯·平托 (João Pedro Matos Pinto)、小大卫·邓盖 (David Dungay, Jr.)，这些名字来自不同国家，但同样是受害者；他们的死亡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存在于全球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并促使示威者走上街头，要求变革。

人们要求终结种族主义，并对其遗留问题给予补救，这不仅在道德上是正确的，而且能促进经济的发展。继续否认种族主义的存在，拒绝正视它，对我们世界的活力、凝聚力和繁荣都会造成伤害。

一个国家的诞生

美国自独立以来就是一个多种族国家，它一直在努力克服许多人所说的“原罪”——奴隶制，以及废除奴隶制之后存在于美国社会中的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种族歧视。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始终是美国的一个负担，美国黑人首当其冲地承受着其中的种种问题。

存在于美国各地警察部门的种族主义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根据《华盛顿邮报》和《卫报》的分析，美国黑人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被警察杀害的可能性是白人的2倍。这是系统性种族主义最广为人知的表现形式之一，但真实问题远不止于此。



例如，种族主义在医学界非常猖獗；2016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现，在美国的医学院中，29%的白人一年级新生认为黑人的血液凝结速度比白人快，21%的人认为黑人有更强的免疫系统。这种误解往往导致预防性医疗措施不足和治疗质量的低劣，进而导致黑人的整体健康状况比白人更差。美国心脏协会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种族主义医学观念导致美国黑人女性死于心脏病的几率比白人女性高出三分之一。

几十年来，种族主义限制了黑人的经济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颁布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促进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壮大，但来自南方的白人国会议员不顾一切地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在他们的坚持下，黑人基本上被剥夺了该法案提供的权利及其相关利益，不管某个黑人是不是战争英雄。联邦住房管理局的“红线政策”拒绝为黑人社区的按揭贷款提供担保，将美国黑人排除在最常见的一条财富积累途径——拥有住房之外。这些因素都影响了持续存在的黑人和白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根据麦肯锡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产阶级黑人家庭的财富比白人家庭少了10倍。

自由、平等、博爱——是给哪些人的？

许多其他国家，如法国，也经历过类似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尽管该国的民族神话声称自己是一个坚定的“色盲社会”。政府拒绝在人口普查中汇集关于信仰、种族或肤色的统计数据。这种普遍主义者的观点掩盖了由历史暴力所导致的现代种族主义。和欧洲许多国家一样，法国在美洲延续以种族为基础的殖民奴隶制中所扮演的角色经常被误解，导致人们认为种族主义是一个新世界而非旧世界的问题。

正如图尔大学非洲移民研究专家马波拉·索马霍罗 (Maboula Soumahoro) 对“法国24小时新闻台”所说：“由于奴隶制在大陆是非法的，于是法国人有了这样一种印象，即现代世界所特有的这种高度种族化的历史只与美洲有关，”他又补充道，“法国并非对种族主义视而不见。法国认

为它根本不存在种族主义。”由于拒绝正视种族问题，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官方政策，这个国家没有为应对系统性种族主义做好准备。

法国的警察执法可能不如美国那么致命，但是暴力和歧视行为更多针对的是少数民族，而不是法国白人。被认为是黑人或阿拉伯人的年轻男性面临身份检查的可能性比白人要高20倍。20%的年轻法国黑人或阿拉伯裔法国人报告说自己在最近与警察的交互中曾遭受暴力对待——这一比例远高于白人的8%。

然而，在美国，这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远远超出了警察执法这一领域。根据智库机构蒙田研究所 (Institute Montaigne) 的数据，在一个宗教信仰往往与种族密切相关的国家，被雇主认为是穆斯林的男性获得面试机会的可能性比被认为是基督徒的求职者低4倍 (Valfort 2015)。巴黎东大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相对于名字听起来像法国人的求职者，名字听起来像阿拉伯人的求职者得到雇主的回应少25%。

种族民主还是种族主义民主？

巴西对种族主义的看法也深深植根于其国家自我形象中。在许多人的眼里，巴西是一个“种族民主”国家。这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巴西1888年废除奴隶制（西半球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后，便直接过渡到了参与式的多种族民主政体国家，避免了美国和南非等国以写入法律等形式所形成的制度性歧视。在许多巴西人的心目中，种族主义和歧视在巴西并不存在，毕竟，巴西从未通过像“吉姆·克劳法” (Jim Crow) 之类的制度性种族隔离法律，所以它怎么可能有真正的种族主义呢？

然而，在一个大多数人口都是非裔或至少带有部分非洲血统的国家，巴西的黑人在主要生活质量指标上远远落后于白人。巴西黑人的受教育程度要低得多。例如，根据2012年的一项调查数据，在16岁以上的非洲裔巴西人中，只有不到13%接受过高等教育，比白人低15个百分点 (Pereira 2016)。

种族主义色彩越淡薄，社会经济越强大。

有些人会把问题归因于阶级差异，而不是种族；然而，一项研究发现，对于生活在同一巴西家庭的一对双胞胎，如果一个被标记为白人，另一个被标记为非白人，非白人双胞胎在受教育程度上明显处于劣势，如果双胞胎是男性的话情况尤甚 (Marteleto and Dondero 2016)。

在执法部门的暴力行为中，巴西黑人也首当其冲。2018年，巴西警方杀害了6220人，尽管黑人占巴西全国人口的一半，但被害人中黑人的比例占到了75% (Sakamoto 2019)。

这些系统性因素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经济后果。巴西地理与统计研究所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白人工作者的平均收入比黑人和棕色人种工作者高出74%，而且多年来这一差距一直保持稳定。即使在同等教育水平下，非洲裔巴西男性的收入也只相当于白人男性的70%，而非裔巴西女性的收入仅为白人女性的41%。

经济成本

系统性种族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我们有强有力的道德理由去解决它。然而，在这场关键对话中，更广泛的经济层面的因素却往往会被忽视。由于系统性的种族主义会阻碍人们充分发挥其在经济方面的潜力，社会也将因此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一个种族歧视程度较轻的社会在经济上会更强大。

例如，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的财富差距预计将导致美国经济2019—2028年在消费和投资领域损失1万亿—1.5万亿美元。这等于美国2028年的GDP直接降低4—6个百分点 (Noel and others 2019)。

或者以法国为例，如果能够减少其在就业机会、工作时间和教育等方面的种族差距，在未来20年里，法国的GDP将增长1.5%，这将是一笔价值36亿美元的经济红利 (Bon-Maury and others 2016)。巴西同样如此，由于社区边缘化等问题，巴西正在失去大量潜在的消费和投资。

一场世界性的灾祸

当然，这三个国家不是唯一存在种族主义并承受着其对社会和经济有害影响的国家，更多国家需要承认并面对种族主义的存在。

例如，在乔治·弗洛伊德抗议事件后对澳大利亚人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78%的受访者表示，美国政府一直不愿解决种族主义问题。与此同时，只有30%的人认为澳大利亚的警察队伍中存在制度性种族主义。但这一观点显然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生活经历不符，同时也与阿尔弗雷德·迪肯研究所认为的2001—2011年澳大利亚因种族主义损失了449亿澳元这一观点有冲突。

各国不应该仅仅因为解决种族主义有助于发展经济才试图去解决它。它是国家欠本国公民的一项债务。世界需要明白这样一点，即对尊重人权和种族平等的承诺不应该只是一个被动的价值观声明。它应该是对行动的呼吁，同时还需要辅以积极的措施来承认、理解、衡量并最终根除系统性的种族主义。世界正处于一个拐点上，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必须直面这一时刻。否则，种族主义将继续让我们所有人付出代价。FD

乌约瑟夫·洛萨维奥 (JOSEPH LOSAVIO) 是世界经济论坛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服务领域的专家。

参考文献：

- Bon-Maury, Gilles, Catherine Bruneau, Clément Dherbécourt, Adama Diallo, Jean Flamand, Christel Gilles, and Alain Trannoy. 2016. "The Economic Cost of Discrimination." France Stratégie report, Paris.
- Marteleto, Leticia J., and Molly Dondero. 2016. "Racial Inequality in Education in Brazil: A Twins Fixed-Effects Approach." *Demography* 53 (4): 1185–205.
- Noel, Nick, Duwain Pinder, Shelley Stewart, and Jason Wright. 2019. "The Economic Impact of Closing the Racial Wealth Gap." McKinsey and Company report, New York.
- Pereira, Claudiney. 2016. "Ethno-Racial Pover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Brazil." CEQ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60, Tulane University, New Orleans.
- Sakamoto, Leonardo. 2019. "More than 75 Percent of Those Killed by Police in 2017 and 2018 Were Black." UOL blog, Sept. 10.
- Valfort, Marie-Anne. 2015.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in Hiring: A Reality." Institut Montaigne report, Paris.



经济学中的 种族问题

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需要敲响警钟，以根除种族歧视

马丁·契哈克、蒙特福特·姆拉契拉、拉特纳·萨哈伊

最近，美国和世界各地都发生了针对警察暴力执法和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这触动了我们共同的良知。作为在一个代表着189个国家的多边机构工作的人员，我们有道义责任公开发声，反对种族主义和歧视。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还有一项职业责任，那就是我们需要揭露种族歧视如何损害人们的生计和经济能力，以及消除种族偏见将如何有助于我们应对社会所面临的许多经济挑战，从而使所有人受益。

然而，要履行这些责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历史错误的一面

经济学领域远未摆脱歧视行为和种族主义的影响。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

格勒 (George Stigler) 曾在1965年提出，作为劳动者来说黑人表现不佳，解决办法是培养其“努力工作的意愿”(Stigler 1965)。这种观点并非个例：它反映了当时经济学家群体和经济机构中存在的偏见。事实上，正如霍华德大学的威廉·斯普里格斯 (William Spriggs) 指出的那样，经济学有“一个深刻而痛苦的根源，但很少有经济学家承认这一点” (Spriggs 2020)。

自斯蒂格勒1965年发表那篇文章以来，经济学对于该问题的辩论一直在进行。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 (Gary Becker) 在其1971年的《歧视经济学》(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一书中指出，包括种族在内的多种因素所导致的歧视会使歧视方和被歧视方的实际收入都有所降低。最近，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杰·切蒂 (Raj Chetty) 及其合著者发现，来自美

照片：ISTOCK/MICHAELJUNG、RYASICK

国低收入家庭的黑人儿童比白人儿童更难达到较高的收入等级，而包括种族偏见在内的环境影响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 (Chetty and others 2020)。

尽管取得了进展，但与其他话题相比，经济学家对种族问题的关注仍然很少。我们收集了过去10年排名前10位的经济学期刊所刊发的所有文章的数据(见图)。在所有7920篇顶级文章中，只有0.2%的文章涉及种族、种族不平等和种族主义问题。与讨论其他问题的文章所占比例相比，比如专门讨论货币政策的文章占比7.4%，这简直微不足道。虽然我们可以认为，更多地去关注“主流”领域(比如货币经济学)是合理的、有必要的，但与其他涉及包容性的话题相比，例如收入分配(2.0%)、贫困(1.4%)和性别(0.8%)，种族问题的覆盖率仍然低了好几倍。

这种不平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少数族裔在经济学家中代表性不足。由于缺乏参照数据，我们很难进行全球性分析，但美国经济学会在其发布的《经济学界少数族裔地位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Minority Groups in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中提供了说明性数据。2018年，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当中，仅有4%是黑人；黑人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占比从1995年的6%下降到2019年的3%，而该种族在美国人口的占比仍然保持在13%左右。黑人在经济学领域所占比例低于该种族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领域的比例(除了黑人之外，其他少数族裔的情况也是如此)。

但是，对种族问题进行严格分析的责任绝不能只落在那些受其不利影响的人身上。我们怎样才能走向历史正确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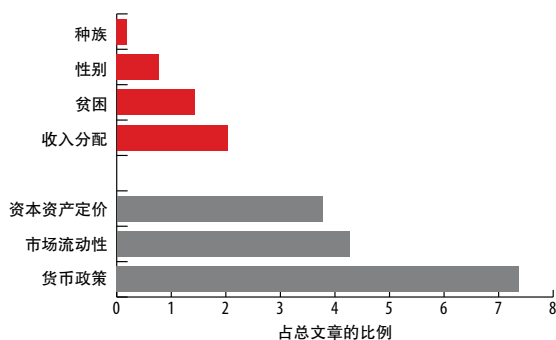
历史正确的一面

在与经济有关的机构中，包括学术机构和政策制定机构，第一步是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来谈论种族主义，提高平等意识，并提供强制性的反偏见培训，其中包括那些无意识的种族偏见。

要根除歧视，首先要承认问题的存在。伊杰马·奥卢奥(Ijeoma Oluo)在其2019年《纽约时报》畅销书《所以你想谈谈种族，是吧》(So You Want to Talk about Race)中认为我们凭借自身经

顶级经济学文章中的种族话题和其他话题

只有很少一部分学术文章涉及种族、种族不平等和种族主义。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微软学术”和《经济学研究论丛》(RePEc)的计算。

注：数据集涵盖了2010—2020年十大经济学期刊的7920篇文章(<https://ideas.repec.org/top/top.journals.all.html>)。该图使用了“微软学术”和RePEc的“研究领域”分类。“种族”包括种族差异和种族主义等相关术语；“性别”包括性别歧视、性别差距和妇女赋权；“货币经济学”包括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传导等术语。

验去筛选信息，去评估各种偏见的合理程度。但是，种族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经验，这使得我们很难去体验并评估他人的种族经验。对于种族问题，虽然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在于纠正系统性的歧视，但如果每个人在个人层面上都保持沉默，这同样将是致命的，因为它会使这一体系长期延续下去。

我们可以通过某些方式鼓励反种族主义者在自己的经济工作中更多地关注种族问题，同时说服持中间立场者减少抗拒心理并推动建设性的讨论，进而促使其转变立场。反过来，随着有关种族的话题和文章不断增多，其他人也会效仿和跟进。反对歧视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研究表明，总体而言，反种族歧视有助于改善经济表现(例如，Sahay and others 2018)。

要想改变现状，经济学家需要进一步拓宽视野。哈佛大学社会学家马里奥·斯莫尔(Mario Small)和已故的德瓦·佩奇(Devah Pager)认为，对于种族歧视问题，经济学家需要更多地采取社会学观点，去研究那些可能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性歧视和日常人际歧视的种种形式(Small and Pager 2020)。

提高经济专业领域中的多元化，包括种族多元化，将是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证据表

作为IMF的工作人员，我们认识到，消除偏见要从自身开始。

明，教师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不仅会在早期阶段影响黑人学生的参与度，在后面的各个阶段，包括录取、就业市场安置、招聘和晋升决定，也是如此。正如约翰·赖斯 (John Rice) 在 2020 年 6 月为《大西洋月刊》撰写的文章《一级种族主义和三级种族主义的区别》(The Difference between First Degree Racism and Third-Degree Racism) 中所指出的，提高种族多元化并不会削弱组织赖以取得成功的、以卓越人才为基础的“精英领导体制”，认为二者之间存在非此即彼关系的观点是一种谬论。必须在所有环节都为少数群体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对解决歧视问题和提高组织效率大有裨益。

少数群体人才往往没有足够的人脉来站稳脚跟，因此积极招募合格的少数群体人才就变得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要多培养和支持他们，帮助他们顺利晋升。例如，美国经济学会的“经济学界少数族裔地位委员会”就发起了几项旨在鼓励少数群体学生学习经济学和追求学术生涯的举措。如果缺乏有助于提高多元化的合适人选，那么社会就需要更深入地去挖掘，以解决偏见的源头——医疗服务、教育机会或获得住房的机会。

作为 IMF 的工作人员，我们认识到，消除偏见要从自身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IMF 的大部分高级管理职位一直为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男性所占据。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 IMF 努力提高多元化，我们开始看到，在提高女性员工数量以及来自东亚、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代表性不足地区的员工数量方面，IMF 已取得了一些进步。自 2003 年开始，IMF 设定了旨在提高性别和区域多样性的基准。区域多样性基准力求使来自某一区域的工作人员的比例与该区域各国对 IMF 资源的出资贡献及其对这些资源的使用大体保持一致。许多人认为这并不能完美地解决种族问题，但其实这些基准并非意在解决种族不平等的问题。我们在实行这些基准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代表性不足的工作人员所占比例及其向

管理职位晋升方面，我们仍有提升空间。

好消息是，IMF 管理层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承诺，并正在采取具体行动，以进一步促进员工聘用中的多元化，并消除包括种族不平等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歧视。IMF 将加强对无意识偏见和“细微不平等”问题的培训，此外还将调整招聘工作的重点，优化晋升程序，为代表性不足的工作人员引入导师计划，并通过员工自愿申报身份的方式，收集多元化方面的数据，包括按种族和民族分列的数据。我们期待 IMF 所有成员国都采取同样的原则，即从国内开始包容。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为提高意识、学习和赋权等活动提供了新的动力。研究表明，经济上更具包容性的组织、城市和社会往往拥有更强劲的韧性，经济也更繁荣。经济学家在变革行动中自有其作用，他们可以帮助建立惠及所有人的包容性体系，但首先，我们每个人，无论个人还是集体，都必须放眼内部，审视自身。FD

马丁·契哈克 (MARTIN ČIHÁK) 是 IMF 战略、政策和检查部宏观金融部门的负责人。蒙特福特·姆拉契拉 (MONTFORT MLACHILA) 是 IMF 驻南非的高级代表。拉特纳·萨哈伊 (RATNA SAHAY) 是 IMF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副主任。

参考文献：

- Chetty, Raj, Nathaniel Hendren, Maggie Jones, and Sonya Porter. 2020. "Race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generational Perspectiv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 (2): 711–83.
- Sahay, Ratna, Martin Čihák, Papa N'Diaye, Adolfo Barajas, Srobona Mitra, Annette Kyobe, Yen Mooi, and Reza Yousefi. 2018. "Women in Finance: A Case for Closing Gaps."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8/0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Small, Mario, and Devah Pager. 2020.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Racial Discrimin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4 (2): 49–67.
- Spriggs, William. 2020. "Is Now a Teachable Moment for Economist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Minnesota.
- Stigler, George. 1965. "The Problem of the Negro." *New Guard* (December): 11–12.



是敌是友？

科技可以增强韧性，也可以加剧不平等，取决于你如何使用它

安德里亚斯·阿德里亚诺

新冠疫情导致全世界封城禁足，也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尝试。数百万专业人士不得不把家当作办公室，开展远程办公。电视主持人在自家客厅主持节目；远程办公的IMF官员在3个月内批准了70多笔紧急贷款；股票交易员在山间小木屋里买卖股票。企业不再担心团队分散各地会降低工作效率；许多公司，包括硅谷巨头，告诉员工不要急着回到办公室工作。远程办公不再是临时性的解决办法或不稳定的自由职业者才会有的选择，而是成了可行的长期解决方案，并已得到大力推广。

科技的进步使得这种全球随机试验成为可能。比如，想象一下如果网讯会议要通过缓慢的拨号上网来实现，将会是怎样一种体验。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连接到高速互联网，进而与云服务相连，可让世界持续保持运转。科技一直是全球经济韧性的一个因素。但对于无力负担高科技或无法从中获得收入的劳动者而言，技术使其被排除在外，加剧了他们遭受的不平等。

根据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其他四位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的统计，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有一半的劳动力一直在家中工作，而之前这一数字只有15%。相比之下，根据2019年的一份报告，巴西58%的家庭甚至连一台电脑都没有。这与IMF最近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能够上网。IMF的另一份报告评估了各种工作的“可远程操作性”，并估计在35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有1亿人由于其工作无法远程完成而面临较高的被解雇或降薪的风险。从事这些工作的大多是年轻人、女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他们多在酒店、餐饮业、建筑和运输行业工作。

总的来说，国家经济越不发达，远程办公就越困难。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人员估计，全世界只有不到 1/5 的员工工作并且生活在能够提供在家工作所需基础设施的国家。这个平均值掩盖了巨大的差异。在北美和西欧，这一比例是 1/3，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个比例为 1/17。

破坏性的创造

经济学家丹尼尔·苏斯金德 (Daniel Susskind) 表示，在短短几周内，新冠疫情对就业造成的破坏就相当于此前预计的自动化用数十年的时间才能达到的程度。在其最新著作《一个没有工作的世界》(A World Without Work) 中，他承认，人类对技术会摧毁工作的恐惧由来已久，几乎从机器诞生那一刻就开始了；但他认为，这一次可能会有所不同。

传统观点认为，创新会导致一些工作消失，但同时也会创造许多新的工作，并将人们从之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去从事其他职业。例如，20 世纪 60 年代自动柜员机的出现并没有取代人类出纳员，它更多的是让他们可以做比处理钞票更复杂的任务。不过，自那以后，技术的发展又催生了网上银行，这大大减少了客户去银行网点办理业务的需求。近年来，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已使得金融机构完全裁撤掉实体分支机构成为可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创造性的破坏”并不会对人类有利。新创造出的工作和消失的工作在地点和技能上并不一定匹配。劳动力的流动性比人们所认为的要低得多。许多专家一致认为，在过去几十年里，自动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对美国等国制造业工作的大规模消失负责。

苏斯金德认为，自动化趋势会随着人工智能 (AI) 的快速发展而加强，因为它加速了机器的进步，让它们在更多任务上具备了超越人类的能力。他写道：“在未来，机器并不会无所不能，但它们能做的确实多了很多。”在他看来，自动化虽然尚未完全取代农业和制造业中的人力，但它已大大减少了工作的数量和质量。

机器人科学家

装配线自动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机器人正在向新的职业扩张，包括医疗服务。德国公

司 KUKA 制造的机械臂可以在丹麦对血液样本进行排序，也可以帮助捷克共和国医疗工作者加快对新冠疫情的检测，混合试剂在棉签检测上可以做得比人类更快更精确。

类似的事例还包括利物浦大学化学实验室里的一台机器，它所能做的更进一步。博士研究生本杰明·伯格 (Benjamin Burger) 利用人工智能为机器编写了程序，让其自行运行科学实验、混合样本并分析结果。这台智能化的机器可以一天工作 22 个小时，并一次性开展为期 8 天的 600 多项测试。伯格说这台机器已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检查成千上万个样本”，他告诉 BBC，“所以它可以让我腾出时间去专注于创新，思考新的解决方案。”这台机器还便于伯格保持社交距离，让他可以在被隔离的情况下继续做实验。但这样一来，实验室可能就不再需要研究助理了，即使是一个都可能多余。

将人们从重复性或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只有在那些人能够找到其他事情做的时候才有意义。那么他们可以做到吗？人类是否在某些领域不需要惧怕竞争？答案是肯定的：需要社交智慧和面对面互动的职业。1980—2012 年，这些工作岗位在美国劳动力中的占比增长了 12%。

至少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是这样。“社交互动程度高、不易受自动化影响的工作恰恰是最容易受到疫情影响的工作，”苏斯金德在牛津大学接受《金融与发展》视频采访时表示，“5 个月之前，书中的许多场景可能听起来有些古怪，但现在它们已经完全成为了主流。”

呼叫全体医生

一些十分典型的面对面职业已能够使用技术迅速地做调整。远程医疗的爆炸式发展是技术带来敏捷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另一方面，它也表明这个过程可能会让一些人被抛在身后。

用视频问诊代替门诊就医是多年之前就可以做到的。但在英国，在新冠疫情之前，只有 1% 的全科医生预约采用这一形式。疫情暴发后，这一数字飙升到了 90%。在美国，一家医疗保险公司报告称，仅在一个州，网上预约便从疫情暴发前的每月 1 万例跃升至 4 月份的 23 万例。

这种暴发式增长并不需要突破性的技术。远程医疗可以像用 Skype 通话一样简单。科技促使人们改变行为，而这种改变正是这场大流行病所推动的。出于安全考虑，病人和医生摒弃了长期以来的行为习惯和疑虑。最近的监管改革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美国，主管机构允许医生以和门诊同样的价格对网上预约收费。患者也不再需要专门去医疗机构进行远程预约。

对于医生和病人来说这种做法效果很好，但这种转变可能会给另一部分人带来不利影响。在线问诊需要的护士、接待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可能都会减少。

大流行病引发了一场文化变革，这可能会让许多领域享受到科技进步的便利，但另一方面，它可能会给就业带来严重后果。电子商务不需要机器人科学家技术。网上购物的普及本身就已经让实体零售商处于劣势。远程工作者可以在线下单购买雀巢胶囊咖啡，以此满足自己对咖啡因的渴望，而不是去那些时尚但却门可罗雀的实体咖啡店。事实上，雀巢公司最近报告称，随着疫情的蔓延，咖啡胶囊的在线订单增加了 30%。

抛弃办公室？

只要疫情仍然是一种威胁，我们就无法判断世界到底是在经历真正的文化变革，还是只是成功完成了一次应急调整。全球性远程办公的实验一夕之间开展起来，让许多人宣称我们所知的办公室时代即将终结。但是，有关其将消亡的说法可能言过其实了。如今被视为救命稻草的这项技术已经存在多年，但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工作方式变革。虽然远程工作有许多潜在的好处——弹性工作时间、更少的通勤时间、人们保住工作、企业可以在任何地方招聘，等等，但居家办公会有何长期后果还有待充分评估。一个显而易见的危险是网络安全：越来越多的人连接到未受保护的的家庭网络，这增加了所谓的“黑客攻击面”。它对于城市、办公区域以及酒店、餐厅、商店和其他服务机构的影响难以估计，但很可能意味深远。

最近被任命为斯坦福大学数字经济实验室主任的布莱恩约弗森认为，这种变化更可能是永久性的，并预测机器学习的使用规模将会扩大。“问题是，经济的哪些部分受影响最大，哪些受

影响较小？”他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说。如果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或疫苗，人们就需要持续保持社交距离，与此同时企业又需要复工复产，这就可能导致自动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而自动化程度更高的装配线则不容易受疫情影响。

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必须让技术为其所用。

“在英国，政府为了保护工人采取了一些干预措施，这抑制了企业推行自动化的动力，”苏斯金德告诉《金融与发展》，“但一旦这些保护措施到期，这种动力可能会再次被释放出来。”

技术让世界保持了活力，但也凸显了我们社会的许多问题：教育、收入、工种。这个困境的解决方案非常复杂。政府需要在短期内投入大量资金，帮助企业留住现有员工、扩大培训和促进再就业，从长远来看，尤其需要加大教育投资，并使更多人接入互联网。这些任务即使对发达经济体来说也十分艰巨，对于那些仍在为基本需求而挣扎的新兴经济体自然更不必说。

也许解决办法就在问题的内部。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必须让技术为其所用，政府必须将包容性作为优先事项。“创新可以带来新的增长，提高生产力，”远程办公能力研究的第一作者埃拉·达布拉-诺里斯 (Era Dabla-Norris) 告诉《金融与发展》，“数字化正在重塑许多人类活动，并可以帮助员工和企业适应这个新世界。最关键的是要创造数字包容性，然后将其转化为经济包容性。”^{FD}

安德里亚斯·阿德里亚诺 (ANDREAS ADRIANO) 是《金融与发展》的工作人员。

23岁的生物学学生萨梅拉·萨特尔-马维正在邮寄一箱口罩。

肖像画：坚韧的样子

萨梅拉·萨特尔-马维
(Samela Satere-Mawe)
巴西玛瑙斯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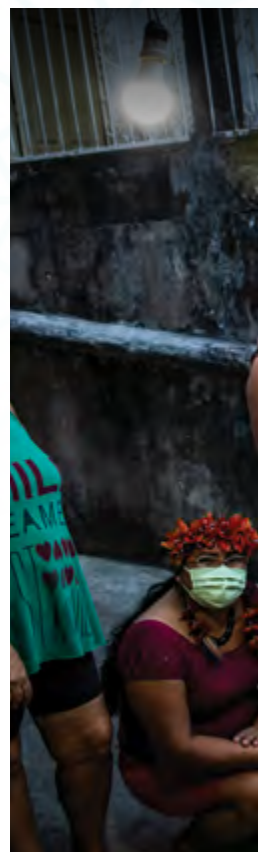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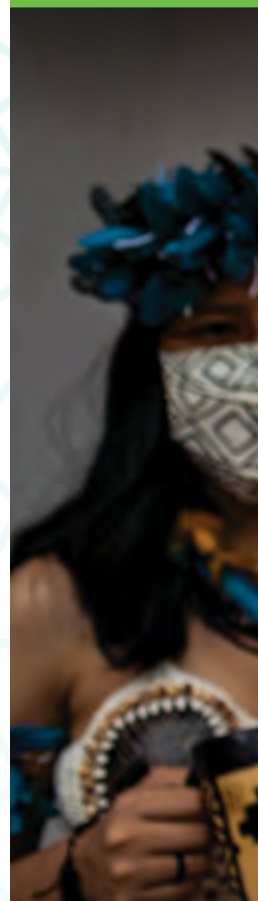
23岁的生物学学生萨梅拉·萨特尔-马维(SAMELA SATERE-MAWE)担任着巴西玛瑙斯市萨特尔-马维原住民妇女协会的秘书。尽管还很年轻，这位本地名字意为“蜜蜂”(samela)的女孩已经致力于为广大原住民争取权利。

长期以来，该协会主要从事于向游客出售亚马逊特产的手工艺品，经营得有声有色，但由于COVID-19，协会的日常活动已经停止。她们开始制作口罩——最初仅供成员自己使用，但后来也开始对外销售。她们的经营活动吸引了一些从事捐赠缝纫机、材料甚至食物的组织的注意。萨梅拉负责协调口罩的生产，这些口罩现已经成了该协会的生命线。协会在疫情期间成功地调整了经营范围，让自己得以继续运营下去。

照片和文章由巴西玛瑙斯市的拉斐尔·阿尔维斯(RAPHAEL ALVES)提供。



结束了一天漫长的工作后，萨梅拉的母亲索尼娅在给她按摩。





协会协调人索尼娅·萨特尔-马维和她的女儿萨梅拉（右）、桑蒂莉（左）一起展示协会制作的口罩。



7月，收到亚马逊可持续发展基金会的捐赠品后，萨特尔-马维原住民妇女协会的成员聚在一起合影。



协会成员在缝制口罩。



由协会打包的防疫口罩。



卢佩·萨尔梅隆·伊瓦拉正在访问她的母校，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埃奇伍德学院。因为是非移民，所以卢佩没有资格申请联邦学生贷款，她必须以国际学生的身份支付学费，这比该州的普通学费高了不少。但埃奇伍德学院仍然为她提供了为数不少的经济资助。

卢佩·萨尔梅隆·伊瓦拉 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

卢佩·萨尔梅隆·伊瓦拉 (LUPE SALMERON IBARRA) 即将从家乡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埃奇伍德学院毕业了，这将使她成为家里第一个获得学位的人。墨西哥的家人本计划会飞过来庆祝。凭借在华盛顿特区的春季实习，她一度很有把握在美国政界争取到一份全职工作。

COVID-19 把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今年3月，当她工作的国会议员办公室和她兼职工作的餐馆都关门后，卢佩这个6岁就来到美国的非法移民无奈回到了麦迪逊。有一段时间，她在信用合作社做出纳员，偿还欠下的高额学费，因为像她这样的非美国公民必须支付高额学费。接着她自己也感染了。

幸好她只有一些轻度症状。结束隔离之后，卢佩回到了工作岗位，之后加入了当地一家旨在帮助拉美裔青年申请大学的非营利组织。在帮助别人实现目标的同时，她也关注着自己的目标。“如果我们这一代有更多的人从政，我们就可以思考这个体系有何问题，并专注于我们想要改变的事情。”

照片和文章由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阿里安娜·林奎斯特 (ARIANA LINDQUIST) 提供。



卢佩在麦迪逊的家中为她的妹妹西米娜（左）做早餐。



卢佩拿着代表她上大学时参加的各种协会的荣誉披肩。



卢佩和高中时的伙伴达米恩·伯克一起骑自行车。麦迪逊是一个政治上进步的城市，有许多标识提醒人们去投票。尽管卢佩热衷政治活动，但她不能投票，因为她是非法移民。她刚满18岁的弟弟将成为家里第一个可以投票的人。



卢佩晚饭后在网飞上看电视剧《实习医生格蕾》。感染了COVID-19之后，她必须隔离10天。



卢佩和达米恩停下来购买柠檬水。

黄昏降临达卡时，人力车司机拉贾·米亚数着自己一天的收入。



晚上，拉贾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玩音乐。



拉贾·米亚 孟加拉国达卡

45岁的拉贾·米亚(RAJA MIA)以蹬人力车为生，他和妻子丽人以及7岁的小儿子比什尔一起生活在孟加拉国的首都。他们住在一居室里，需要和邻居共用厨卫设施。

拉贾来自农村，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他搬到了达卡。平常日子里，拉贾一天能挣7美元，勉强够养家糊口。新冠疫情危机暴发后，从3月25日开始，达卡正式采取封紧措施，他的收入骤减，他和家人不得不依靠邻居赠送的食物维持生活。拉贾每天的收入跌至2.5美元。有些时候，他只是待在家里。他并不太担心感染COVID-19。“如果我无法工作，我们迟早也是要饿死的。”他说。FD

照片和文章由孟加拉国达卡的K.M.阿萨德(K.M. ASAD)提供。



拉贾将人力车从车库推出来去接一位乘客。



拉贾和家人住在首都一个10×10英尺的房间里。



一位顾客支付拉贾车费。



拉贾佩戴着口罩。

经济学界的 鼓动者

鲍勃·席米森采访伦敦大学学院的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她是一位政府主导创新的坚定支持者

即使在餐桌上，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 (Mariana Mazzucato) 都发挥了她作为沟通者的非凡技能，使其家人在伦敦疫情封禁期间也闲不起来。

她和她的丈夫，意大利电影制作人卡洛·克雷斯特罗-迪纳 (Carlo Cresto-Dina)，坚持每天晚上在他们伦敦的家里坐下来吃一顿正式的晚餐。交谈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混搭着使用意大利语和英语。学校、工作、电影和经济都是他们讨论的话题。

“我们通常会选择一个话题来讨论，对于我们来说，每个夜晚都是和孩子们之间的一场大辩论。”克雷斯特罗-迪纳说道。4个孩子的年龄分别是20岁、17岁和14岁（最小的是一对双胞胎）。“在封禁期间，她还给双胞胎布置了一个关于数字鸿沟的研究项目，”他说，当时“他们很不乐意，大声嚷嚷着表示抗议。”

在家庭之外，马祖卡托已在经济和公共政策领域深耕了10年，是该领域的一名“鼓动者”。她的主要观点是，各国政府需要利用手中的权力，以人类福祉的提升为目的来领导创新。目前，作为多个国家疫情应对特别工作组的成员，同时也作为她寻常所扮演的经济界鼓动者，她正专注于将自己的观点应用到新冠疫情危机的应对中。

“我们无法真正摆脱新冠疫情，”她说，“除非我们重新深入思考国家的作用，确切地说就是，它是做什么用的？”

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颇具争议：政府的职责是设定远大的目标，明确其中涉及的各项任务，鼓励创新并投资创新，统筹管理整个过程，并最终使公众受益。这种观点与现代的政治常识相矛盾。在人们的传统认知里，政府的职责是在灾难发生之后收拾残局并解决严重的市场失衡问题，而如果政府无法胜任，那它就需要虚位让贤，由私人企业引领创新。

马祖卡托说，正是这种观念导致了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大波破坏性的政府紧缩政策，尤其是在欧洲。

“空心化”的政府能力

她说：“我所看到的只是以创新的名义削减社会服务和公共投资。”作为创新领域的专家，她感到震惊，甚至恐怖。她在2013年出版的《创业型国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谜》(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一书中阐述了为什么自己要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她在书中指出，医疗保健、科学技术以及其他领域的许

多私人创新都依赖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那些研究是私人企业不能或不愿投资的。她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如果我不是曾亲眼目睹那些苦难，我不确定自己是否会开展这项工作。”

马祖卡托认为，在世界不同地区，新冠疫情造成的痛苦程度不同，这个事实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论点。这位52岁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是伦敦大学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专注于创新和公共价值领域，她也是伦敦大学学院“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所”的创始人。

“我们看待国家的方式过于狭隘，这会导致国家的能力被空心化，”她说，“如果政府的作用只是修复市场失灵，之后就功成身退，那么它就没有太多动力对知识创造机制进行投资，无法参与价值的共同创造。”她表示这在英国和美国尤其明显，在这两个国家，政治领导人削减了公共卫生资金，并降低了政府自身的价值，这最终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

马祖卡托还认为，相比之下，一些小得多、不那么富裕的国家的政府在疫情应对上比美国和英国更有效。她以越南、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新西兰和丹麦为例，这些国家或省/州长期以来在政府能力方面做了大量投资，在采取封禁措施、提供防护设备和塑造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方面表现都很出色，因此也能够更好地应对危机。

肩负使命的女人

《创业型国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谜》出版之后，马祖卡托俨然已经成为全球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她在2018年出版的《万物价值：加入并决策全球经济》(The Value of Everything: Making and Tak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中对其论题作了进一步拓展。

她成了英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常客。她出现在CNN、PBS和BBC广受欢迎的“荒岛电台”广播节目中，并在今年和去年都在TED大会上发表了演讲。她定期为《金融时报》和《卫报》等杂志撰写评论文章，还先后被《连线》《伦敦时报》《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石英》和《快公司》等媒体作为评论人物进行专门报道。

在这个过程中，马祖卡托获得了多个经济学奖项，被多国政策制定者争相聘用为顾问，一时间炙手可热。南非、意大利和梵蒂冈都邀请她加入其疫情应对特别工作组。目前她分别担任着苏格兰政府的经济顾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增长顾问、挪

威的研究政策顾问以及欧盟的研究和创新顾问。

马祖卡托出生在罗马，在她5岁时，她的核物理学家父亲接受了普林斯顿大学等离子物理实验室的一份工作，于是她跟随父母来到美国。她从教烹饪艺术的母亲那里学会了意大利烹饪和烘焙。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公立高中毕业之后，她去了马萨诸塞州的塔夫斯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业，并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过去的20年里，她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英国工作，2017年，她进入伦敦大学学院工作。

“她改变了关于政府角色的讨论。”艾默斯特市马萨诸塞大学的经济学家教授格雷戈尔·塞米纽克(Gregor Semieniuk)说。他曾在位于英国布莱顿的苏塞克斯大学与马祖卡托一起做博士后研究。“她非常雄辩地论证了这样一点，即政府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可以推动而不是阻碍问题的解决。”他说。

马祖卡托在《创业型国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谜》中指出，美国政府一向资助制药研究，这间接帮助了制药商发明新的疗法，其在研发苹果手机和相关产品背后的技术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她认为，这些案例可以说明政府可以推动创新，从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促进经济更快增长并广泛提高社会福利。这位教授经常引用美国政府20世纪60年代主导的人类登月计划，该计划当时曾在几十个领域掀起创新的浪潮。

直面批评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她的观点。内布拉斯加州大学奥马哈分校的经济学家阿瑟·戴蒙德(Arthur Diamond)认为，马祖卡托的观点听起来太像由中央计划的产业政策，他认为这个路子行不通，因为就其本质而言政府无法促进创新。在他2019年出版的《对创造性破坏放开心态：保持创新的活力》(Openness to Creative Destruction: Sustaining innovation Dynamism)一书中，他提出，真正推动创新的是那些深深沉迷于自己的研究创造且能从中获益的企业家，他们之所以能成功，凭借的是热情、执着、直觉以及普通又老式的不断试错，最后或许再加上一点运气。

“政府决策者不会那样深地专注于问题，不会有详尽细致的相关资料和信息，也不会有能力跟随直觉找到突破性的解决方案。”戴蒙德说。

对马祖卡托最尖锐的批评可能来自阿尔贝托·明加迪(Alberto Mingardi)，他是米兰语言与传播自由大学的政治思想史学家，同时还担任着意大利自由市场智库米兰布鲁诺·莱昂尼研究所(Istituto Bruno Leoni)的总干事。2015年，他发表了一份长达23页的对《创业型国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谜》的评论，里面列出了32条参考资料。他认为，马祖卡托的“证据是不可靠的”，而且“尽管她对政府干预大加赞赏，称其十分有益，但她未能证明那些干预是在有意识地引导下取得了那些特定成果”。

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我的看法是，她的《创业型国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谜》是围绕这样一个核心观点展开论述的，即军方的技术投资对民用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但她假装这些不是积极的溢出效应，而是指向性政策的结果，与此同时，她却未能证明自己的论点。”

马祖卡托回应称，这些批评忽略了政府在新技术研发的早期阶段(同时也是风险最高的阶段)所提供的支持。她表示，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和微软的比尔·盖茨均曾表示自己是依靠某些业已存在的科技进步才得以开创自己的事业，而那些科技进步则要归功于由政府资助的组织。她又补充说，已有62年历史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其成立之初的宗旨就是为了承担风险，今天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正是建立在它们的研究成果之上的。

“如果政府部门如此不适合追求直觉和意外收获，你如何解释美国在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之后建立了全球定位系统，多年之后又扶持了市值数十亿美元的出租车公司？”马祖卡托说，“如果优步是创造性颠覆的典范，你又如何解释它是如此完全彻底地依赖于完全由政府支持和开发的创新呢？”

马祖卡托也反对那些认为她赞同中央计划的说法。

“相反，国家应该给经济指明方向——尽早进行必要的投资，但同时也要管理好这个过程，以确保国民能够从中受益。”她说。这意味着要确保专利不被滥用，药品的价格能够反映出政府在其研发过程中投入的公共资金，这样就可避免让纳税人再次掏钱买单。她认为，这需要一种塑造市场、而非操纵市场的政策方针。

马祖卡托写了《万物价值：加入并决策全球经济》，她说：“因为，即使我在《创业型国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谜》中的观点真的流行起来，并最终在

许多国家引发真正的政策变革，我们最终也需要直面谁才是财富的创造者这一根本原则，尤其需要面对‘什么是价值’这一基本经济理论的影响和后果。”

被低估的基层工作者

新冠疫情使这个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许多被认为是最基本、最必要的工作者——从杂货店店员到送货司机，再到护士和医院护理员，也有一部分属于最低收入者。马祖卡托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中与会计相关的扭曲：GDP计算中计入了金融服务，因为，尽管这种服务没有创造任何新的东西，但其过程中会产生费用；另一方面，人们又很难对健全的公共卫生或公共教育体系进行估价。

“我们需要重视经济的基本部分并为其提供所需的资源，”马祖卡托说，“价值的创造未能与这类工作者分享，这意味着实际工资增长没有跟上生产力的增长。”马祖卡托在其第二本书里指出，美国今天的经济规模已是40年前的3倍，但经过通胀调整之后的工人工资并没有太大增长。

马祖卡托认为，在疫情期间，各国政府在支撑经济和救助企业的同时，应当利用其影响力和手段对竞争环境进行大幅调整。她认为，政府拨款和贷款应附带严格的条件。例如，作为救助的附带条件，政府可以要求航空公司降低碳排放。

在《纽约时报》7月1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马祖卡托敦促实施“公民分红”，并主张政府应当在与公共资金有关的企业中持有股份。她写道：“这样做只是在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企业的首选求助对象，政府可以像一位对绿色转型等社会项目进行投资的风险投资家一样思考和行事，并从中获益。”

“新冠病毒疫苗研发竞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马祖卡托在文章中写到，“药品的售价并没有反映出政府通过公共资源对医学研究的巨额投入——2019年，这一数字超过了400亿美元。新冠疫苗在定价时必须考虑到公共资源对研究的资助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公私合作关系，并确保疫苗相关专利得到分享，而且疫苗必须能普遍获得，并且需要是免费的。”

培训公务员

在伦敦罗素广场的一个六层建筑里，马祖卡托


主持着她创立了两年半的“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所”。她的一个30人团队正在开发一个公共管理硕士项目，重点专注于创新、公共政策和公共价值等领域。她的目标是通过培训公务员将自己的理念应用于政府工作中。凭借来自教学收入、研究基金和政策咨询的预算，该研究所已取得一系列成果，包括帮助苏格兰建立了一家全国性投资银行，帮助欧盟采取了一项基于任务的研究和创新政策，并协助英国政府制定了一项创新和产业战略。

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是一位专门研究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英裔委内瑞拉学者，在她看来，马祖卡托的主要贡献是挑战了人们对政府角色的认识和提出了价值和价格脱节的问题，此外，她还通过与政府的合作将理论和政策实践重新联系起来。佩蕾丝是马祖卡托研究所的名誉教授，曾在2002年出版《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 The Dynamics of Bubbles and Golden Ages)一书。

“她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女性，敢于直面势力庞大的经济学界的建制派；这些建制派学者很多次都未能识别泡沫和预测崩溃，根据他们的理论制定的政策也从未获得真正的成功，但它们仍然十分顽固地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佩蕾丝说道。长期以来，女性在经济学领域始终处于劣势地位，但马祖卡托最终脱颖而出。在佩蕾丝看来：“她是一个明星，是女性所能取得成就的绝佳典范。”

就马祖卡托自己而言，她认为自己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这一次，对于政府削减预算来拯救遭受疫情冲击的全球经济的做法，迄今鲜有人讨论。但她发出了警告。

“要保持警惕，”她说，即使各国政府打开了财政的水龙头以应对疫情造成的下行压力，“也不要认为我们不会面临财政紧缩。”她认为，英国已经有人提出了“负担分摊”的说法，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可能需要偿还由中央政府垫付的资金。

“这将意味着政府会削减在疫情期间逐渐为人所了解其价值并被称为‘必需品’的服务、系统和结构，”马祖卡托说，“前方还有一场大战。”

鲍勃·席米森(BOB SIMISON)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和编辑，曾在《华尔街日报》、《底特律新闻报》和彭博新闻社等机构任职。



坚持到底

牙买加前央行行长布赖恩·温特解释货币政策现代化过程中的挑战

长期以来，牙买加一直面临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公债，并经常遭遇极高的通胀。最近，该国在稳定经济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功——但之后，该国遭受了新冠疫情的重创。

布赖恩·温特 (Brian Wynter) 在 2009—2019 年担任牙买加央行行长，是该国经济转型的核心人物。在他的领导下，牙买加加强了货币政策，并设定了稳定物价、提高汇率灵活性和大量积累外汇储备等目标。牙买加央行曾使用雷鬼音乐发起一场颇具创新精神的宣传活动，向该国长期习惯于关注汇率的公众解释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好处，希望以此赢得公众的信任和理解。

《金融与发展》记者奥尔加·斯坦科娃 (Olga Stankova) 对温特进行了专访，他谈到牙买加经济政策面临的挑战。

F&D： 一直以来，汇率在牙买加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你们是如何决定着手改革这一制度的？

BW： 之前的许多年里，我们一直认为我们实行的是一种灵活的汇率制度。但现在回头看，它其实相当僵硬。人们自认为在做的和实际所做的事情之间可能有很大的差别。按照 IMF 的评估，我们事实上拥有的是一个类似爬行盯住制的汇率制度。

我们宏观经济的一些其它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这给汇率政策带来了挑战。财政扩张有时会对国际收支产生影响，导致汇率被高估，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进行财政改革时，国家及其领导人需要做一些艰难的决定。我们于 2010 年首次制定财政规则，然后在 2014 年对其进行完善。正如现在所提议的那样，设立财政委员会将有助于让人们更独立地去思考问题，让人们对经济预测更加信任。我参与了由 IMF 支持开展的三个规划，所有这些项目都旨在帮助我们解决财政问题、稳定债务形式、控制通货膨胀和避免汇率失调。

在通货膨胀目标框架下给予央行充分的独立性，同时提高汇率的灵活性，这是对财政规则的一个重要补充。根据新出台的法规，如果牙买加央行被授权管理通货膨胀，且被授予更多独立性，它就要承担起向公众解释的义务，比如为什么当政府说应该降息时它反而要加息，这就要给公众一个解释。转向通货膨胀目标制已迫使央行加强沟通。

目前来说，这条改革之路的终点还远未到来。

F&D： 对于那些希望提高汇率灵活性的国家，除了通货膨胀目标制之外，您认为还有其他可行的选择吗？货币目标制如何？

BW： 这取决于各国的具体国情。就牙买加而言，我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曾尝试从货币总量入手，但我们发现它根本不起作用。变量没有发挥作用，变量和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断掉了。我想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汇率制度是一项具有重大影响的深层次政策选择。但是除了汇率制度之外，你还需要其他各种配套的政策工具，而牙买加的现实条件让我们更能建立一个拥有灵活汇率制度的有韧性且繁荣

的经济。

F&D：人们一直在讨论将各种政策工具整合到一个整体框架当中，包括利率、外汇干预、宏观审慎措施以及资本管制等。开放型小型经济体要想成功做到这一点，需要满足哪些前提条件？

BW：牙买加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发展中经济体，我们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才能让所有这些组件充分发挥作用，在那之前，一体化将始终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我们就需要思考并着手处理相关问题。财政政策和劳工政策也都必须服务于这个统一的宏观框架。

我们最终能够实现各种政策工具的复杂整合，但在此过程中，当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需要解决时，我们不能被此过度束缚，这一点十分重要。

坚持不懈，一次只专注于解决一个问题，循序渐进地把每一件事做好，这是许多发展速度最快国家最主要的成功秘诀。

F&D：关于这个统一框架中的一环，也就是外汇干预，您认为是否需要制定一些相关的规则？

BW：央行需要制定一些简单而明确的外汇干预规则。有了规则人们才会安心。许多利益相关者都希望有明确的规则可以遵守。但这也并非黑白分明的。在实施规则的同时，央行也必须保留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央行还必须拥有压倒性的力量来推动市场。将几个商人聚在一起，他们会想方设法赚到尽可能多的钱，结果可能就是把收益私有化，把损失社会化。央行需要保护市场免受这种影响。你需要一些规则，但同时也必须保留应对不良行为的能力。

F&D：您如何看待政策沟通在获取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中的作用？

BW：沟通的作用是巨大的。2018年，我们尝试为牙买加央行争取更大的独立性，那时候我意识到对央行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它和公众的关系。在一个民主国家，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关于公众的。

我们十分看重货币政策的机制，这是技术方面，这当然很重要。但是，即使这中间你有一半判断错了，最后的结果仍然可能是正确的。但



“稳定的低通胀对于经济就像低音线对于雷鬼音乐一样重要。”

照片：COURTESY OF THE BANK OF JAMAICA

是对于沟通来说，你不可能在沟通出错的情况下仍然获得正确的结果。我曾经一直认为，在央行应将30%至40%的注意力放在货币政策机制上，将10%的注意力放在政策沟通上。但后来我改变了看法：沟通应占30%或40%。

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货币政策一直以来的要义所在。利益相关者会怎么想？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这会促进他们更多消费吗？他们是打算多买还是少买外汇？

F&D：牙买加央行使用雷鬼音乐向那些长期关注汇率的公众解释稳定的低通胀的好处。这种方法有效果吗？

BW：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效果。雷鬼音乐对我们的民众是一种非常直接的吸引力，而电视广告和广播广告，尤其是那些仍然将通货膨胀描绘成怪物的广告牌，这就有些不合时宜了。

但央行不能把这面鼓敲得太久或太重。它需要连接到某些东西上，但我现在还看不出它是如何连接的。有效沟通最理想的效果是民众更加理解我们的政策，或者关注政府的决策。

剩下的最大挑战之一是让公众明白，央行的职责并不在于阻止汇率波动。要想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和富有韧性的经济体，我们需要克服我们的体系内部那股总倾向于让汇率变得更僵硬的力量。我曾见证牙买加成功实施了许多艰难的改革，我相信这次变革同样会取得成功。**FD**

本采访稿因篇幅原因和清晰表意而有所删改。



一盎司的预防

我们的疫苗融资方法不适合应对疫情风险

大卫·E.布鲁姆、丹尼尔·卡达雷特、丹尼尔·L.托尔托里斯

我们的世界始终面临着疫情暴发与蔓延的威胁。全球范围内，新冠疫情在多地仍未表现出衰退之势，而在另外一些地方，管控上稍微松懈就可能再次导致疫情再度暴发。除新冠疫情之外，我们还面临着其他已知和未知病原体的潜在出现和传播风险，它们或许没有那么迫在眉睫，但同样构成重大风险。

鉴于流行病在健康、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造成的重大后果以及采取应对措施所需的高昂成本，那些以预防或迅速应对新发传染病为目的的生物制药对策就具有了巨大的价值。越来越多的研究

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疫苗接种的总体社会价值远远超出传统的经济层面的评估，这种评估固守传统思维，只考虑了直接健康利益和医疗成本节约两个方面，是非常狭隘的。

但是，如果依靠群体免疫来控制传染病，我们需要在研发、产能和交付能力方面投入大量资金。

民谚有云：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这句话从未像现在这样正确。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如何确保我们投入的盎司数目是正确的？以及，这些投资从何而来？



“恐慌和忽视”

目前的疫苗研发和生产体系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型跨国制药公司的盈利工具，但的确也已经研制出多种疫苗，被发达国家广泛用于治疗各种常见的地方性疾病。在那些既有能力也有意愿的出资人或强大的慈善资金的推动下，近年来，针对肺炎球菌疾病、人类乳突病毒、轮状病毒和季节性流感的新疫苗已被推向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无论穷国富国）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同时每年创造出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同样，新冠疫苗也有望以创纪录的速度开发出来，但即使是这样，对于其能否在1—2年内进入市场并广泛应用，即使是最乐观的预测也远不能确定。

但是，目前的疫苗研发和生产模式也有其局限性，对那些几乎只影响低收入国家的疾病以及个体发病概率低但致命性高的流行病，包括埃博拉类出血热、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寨卡病毒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优先研究疾病蓝图清单中所列的其他疾病（WHO 2020），其效果明显较差。对于全球三大传染病杀手——结核病、疟疾和人体免疫缺陷病毒，人类仍未能研制出高质量的疫苗，而且，尽管早有承诺，但埃博拉疫苗的最终面世时间却被长期拖延。这些都表明了该体系存在缺陷。

许多观察人士称，在针对潜在流行性疾病的预防性投资方面，存在一个“恐慌和忽视”的循环。例如，2002—2004年SARS大流行期间和之后，公共和私人部门针对冠状病毒疫苗的研发投入了大量资金，但随后数年内，由于直接威胁减轻，相关投资也随之急剧减少。总的来说，国际社会对于流行病预防的投入远远少于对治疗的投入：疫苗销售每年创造约400亿—600亿美元的收入，但全球疫苗市场大约只占全球医药市场总额的3%—5%。

一些新成立的国际实体，如流行病防范创新

联盟（CEPI）和现有的全球卫生机构，如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维康信托基金会正在尝试解决一些尚未得到响应（利润率不足）的疫苗需求。CEPI的主要目标是支持疫苗的研发工作，而GAVI则侧重于支持疫苗的交付（当市场需求增加时，亦支持生产），而盖茨基金会和维康信托基金会则主要负责向前两者以及其他机构提供所需的资金。

但是，尽管这些机构做了大量努力，尽管新冠疫情和近年曾多次暴发的埃博拉疫情引发了人们对全球卫生安全的关注，但其中一些最突出的挑战仍然存在。世界需要健全的机制来推动安全、有效和负担得起的疫苗的开发、制造和分发，从而预防潜在的流行性疾病，尤其是那些主要威胁较贫穷国家的疾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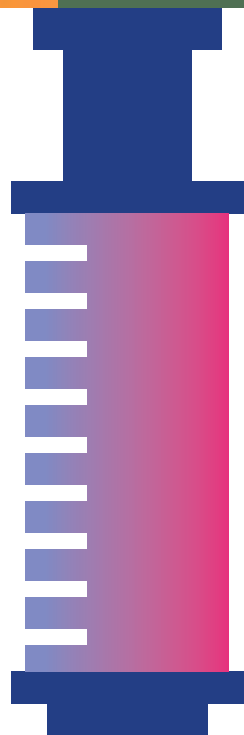
挑战

对于一些盈利前景不确定的疫苗，其生产和交付过程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最突出的有成本高、时间跨度长、研发失败风险巨大、需求有限、集体筹资难，以及各种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

疫苗的研发和生产成本十分高昂。对于一种成功的疫苗，其总体研发成本大概在2亿—5亿美元，其中包括研发失败的沉没成本。而新疫苗的大规模生产也需要专门的生产设施，其建造和维护可能会使总成本再增加5亿—15亿美元（Plotkin and others 2017）。

除了成本高昂之外，疫苗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开发、测试、大规模生产和分发的整个过程。从开始研究到三期临床试验结束，整个过程耗时十多年的情况并不少见；三期临床试验通常是疫苗开发流程的最后一步，再之后，疫苗就可以进行注册并投入使用了。

有时，建议将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计划的要求甚至进一步推迟了疫苗面世的时间。2013年的一





项研究(Blank and others 2013)发现,在欧洲各国,从新疫苗获得上市许可到投入广泛使用,平均要花6.4年的时间。

疫苗研发所产生的知识是一项全球公共产品。

除了时间跨度长和投资成本高,疫苗研发还面临候选疫苗研制失败的巨大风险,即使是前述疾病的那些已研制成功的疫苗,也面临着相当大的盈利风险。之所以不盈利,除了目标市场购买力低,还由于产品需要面对来自其他疫苗开发商的竞争,以及以其他形式存在的潜在替代品的竞争,包括有效抗菌剂和其他生物医学对策,比如单克隆抗体。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疫苗最终无法盈利。至于那些预防潜在流行性疾病的疫苗而言,如果没有事先购货协议,其市场需求显然将取决于疫情是否发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对疫苗持一种犹豫不决的态度,这同样可能影响其市场需求。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要投资于一种能够应对这些挑战的疫苗,将是一项极其困难的任务。正如经济学文献中所表明的那样,对于回报不确定的研发项目,私人企业倾向于延迟投资,直到项目的预期利润超过其自身成本加上延迟投资相关利益的总和(Pindyck 1991)。因此,当一种疫苗的价值对时间特别敏感时(针对新出现病原体的疫苗通常都是这种情况),政府或慈善组织可以向制药企业提供保证,帮助降低其在临床试验和生产过程各个阶段的投资风险,从而加快疫苗开发速度。

对大型制药公司来说,研发疫苗所需的必要支出带来了巨大的机会成本,这使得私人投资面对疫苗开发项目时往往需要更多考虑。这是因为,

现有的市场结构允许这些制药公司通过投资其他产品线,比如慢性病的治疗,来赚取专利授权的超额利润。

疫苗研发所产生的知识(包括新疫苗的所有配方)是一项全球公共品;此外,免疫接种还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外部效应,包括中断部分疾病的传播、降低抗菌素的耐药性,还包括可能有助于改善宏观经济表现等。因此,对疫苗研发和生产进行集体性公共融资就成了一种较有吸引力的替代办法,可以替代被专利授权相关利润所驱动的私人融资。但这也带来了一些困难;较突出的一个是经济学中所谓的搭便车问题:如果疫苗研发所产生的知识可以公开获取,单个国家对疫苗生产进行投资的积极性就会降低。另一个重大挑战是,在选定有效候选疫苗的问题上,相对于市场力量,中央决策是否更为有效。

某些政治现实也会对集体融资构成潜在障碍。对于民主选举产生的官员来说,如果相关项目——比如疫苗平台或为流行病的预防保留某些产能,无法在其任职期间产生明显回报,他们可能就没有太多动机批准相关投资。而在新型传染病尚未大范围传播之前,公众根本不会认为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民意上的缺失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官员对疫苗投资缺少热情。在许多情况下,公众可能整体上缺乏对科学和政治权威的信任,这同样会削弱其对大流行病防范工作以及其他公共卫生举措的支持。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新冠疫情期间出现了一种被称为“疫苗民族主义”的现象,即有些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当局可能已避开了国际合作,转而将希望寄托在某些特定的候选疫苗上。这是因为,如果这些候选疫苗能够见效,它们就会拥有对其的控制权。“疫苗民族主义”的存在将会使疫苗在研制成功之初无法到达最需要它的地方,从而无法产生最大的效益。



解决方法

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一些强有力的工具可用来自应对这些挑战。

在加快疫苗研发和生产方面，我们可以加大对尖端疫苗平台的投资，以加快研发速度，例如部分研发人员目前正在使用 mRNA 技术生产候选新冠疫苗。各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还可以努力开辟特殊监管渠道，在确保基本安全要求得到满足的同时，加快候选疫苗在流行病期间的审批速度。而为了加快生产速度，各国政府以及 GAVI、盖茨基金会和维康信托基金会等国际资助机构可以和制药公司签订合同，以便在紧急情况下直接使用其生产设施。

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或新的传染病威胁技术咨询理事会 (Bloom and Cadarette 2019) 可以进一步扩大目前的优先研究疾病蓝图清单范围，制定整体预算和行动计划，为相关的研发活动提供资金，并降低与疫苗生产有关的风险。

至于疫苗的集体融资问题，显然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例如，发达国家集团，包括经合组织、七国集团和欧盟，可以向国际组织承诺提供为期数年的专项资金，为新型病原体疫苗的研发、生产和购买提供支持。除此之外，还可以增加对 CEPI 的资助，进一步扩大赞助者群体，并通过赞助更多候选疫苗开发项目和支持疫苗开发者组织进入 (或者通过) 三期临床试验来扩大其权威。这些都是具体可行的行动。

所有这些集体努力都将有助于提高流行病疫苗的可负担性，从而使贫穷国家的人们能够更方便地获得疫苗。此外，还可以针对早期研发活动的公共资金设置一些条件，比如设置价格上限或对后期疫苗产品采用强制许可的授权方式；这些也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

最后，关于政治问题，或许我们总能找到理由来说服政策制定者，即投资于疫苗和其他预防措施以预防潜在流行性疾病，相当于购买一种具有社会价值的保险。或者，储备疫苗来对抗潜在

的流行病就像拥有一支常备军来应对一场未知的战争；这些都颇具说服力。让公众相信这些措施的价值可能推动政策制定者的问责制。

实施公共干预

总而言之，疫情威胁对人类的健康与进步均构成了巨大风险。疫苗是我们应对这一风险的最有价值的工具之一。

尽管针对潜在流行性疾病的疫苗接种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但疫苗经济学的某些方面使得疫苗的研发、生产和使用面临着各种难题，使其无法实现最大的社会价值。由于疫苗研发及其创造的知识是全球公共产品，而且接种疫苗具有重大的正外部性，所以其市场供应往往会不足。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公共干预来为疫苗的研发、制造、融资和交付提供支持；这一点大概率是以集体融资和对现有机构进行监管的形式来实现。

新冠疫情凸显了我们当前疫苗研发、生产和交付体系的脆弱性，在下一个新型病原体在人类宿主中站稳脚跟之前，世界最好加强这一体系。FD

大卫·E·布鲁姆 (DAVID E. BLOOM) 是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的经济学和人口学教授，丹尼尔·卡德雷特 (DANIEL CADARETTE) 是该学院的研究助理。丹尼尔·L·托尔托里斯 (DANIEL L. TORTORICE) 是圣十字学院的经济助教。

参考文献：

Blank, Patricia R., Matthias Schwenkgenks, Christelle Saint Sardos, Julien Patris, and Thomas D. Szucs. 2013. "Population Access to New Vaccines in European Countries." *Vaccine* 31 (27): 2862–67.

Bloom, David E., and Daniel Cadarette. 2019. "Infectious Disease Threa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Response." *Frontiers in Immunology* 10:549.

Pindyck, Robert S. 1991. "Irreversibility, Uncertainty, and Invest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9 (3): 1110–48.

Plotkin, Stanley, James M. Robinson, Gerard Cunningham, Robyn Iqbal, and Shannon Larsen. 2017. "The Complexity and Cost of Vaccine Manufacturing—An Overview." *Vaccine* 35 (33): 4064–7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20. "Prioritizing Disease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Emergency Contexts." Geneva.

粮食不安全

新冠疫情正在引发全球新一轮粮食危机

冲突、极端天气和经济衰退已经导致全球范围内 1.35 亿人处于严重的饥荒之中。根据《2020 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2020 Global Report on Food crisis), 新冠疫情可能导致这一数字再增加一倍以上。

今年是粮食危机报告问世以来的第四年, 而该报告昭示着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 面临粮食安全危机或状况更糟的人数从 2016 年的 1.08 亿人还在继续上升。

新冠疫情给各国造成混乱, 并其公共卫生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 且对贫穷国家的影响尤为严重, 这些国家的人们对“饥荒盛行”的担忧日益加剧。在受严重粮食不安全影响的人口中, 有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非洲, 而那儿的冲突、天气事件和虫灾本就已经造成了损失。按照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统一框架(IPC/CH)的定义, 在南苏丹和也门有超过一半的人处于“粮食安全危机”或更糟糕的状况中

按照 IPC/CH 的级别划分, 第三级“粮食安全危机”意味着家庭严重营养不良, 或者必须将全部收入用于满足最基本的粮食需求。在第三级之上是第四和第五两个危机级别, 二者分别对应“突发事件”和“灾难/饥荒”。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 到 2020 年年底, 在该机构进行运作的国家, 饥饿人口将为 2.7 亿, 比疫情暴发前高出 82%。

全球范围内, 大多数主要作物的储备仍然充足, 但新冠疫情暴发打乱了原本已处于紧张状态的粮食系统。联合国预测, 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包括市场对国际农产品的需求急剧下降、卖方和买方无法进入当地小型食品市场以及汇款等来源的收入减少, 粮食安全将面临新的威胁。FD

IMF的亚当·贝苏迪(ADAM BEHSUDI)根据粮食安全信息网络的《2020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所编写。

日益严重的粮食安全危机



55个国家的**1.35亿人**
处于粮食危机或更糟的状况
(IPC/CH第三级或更高的级别)

往年的数字

2016

48个国家的
1.08亿人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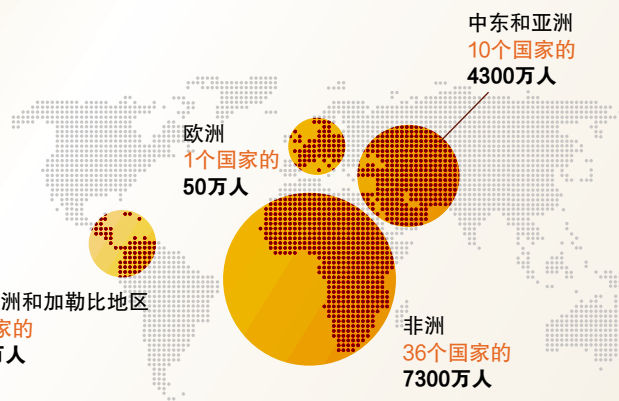
51个国家的
1.24亿人

2018

53个国家的
1.13亿人

资料来源: 粮食安全信息网络,《2020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

一半以上受影响的人生活在**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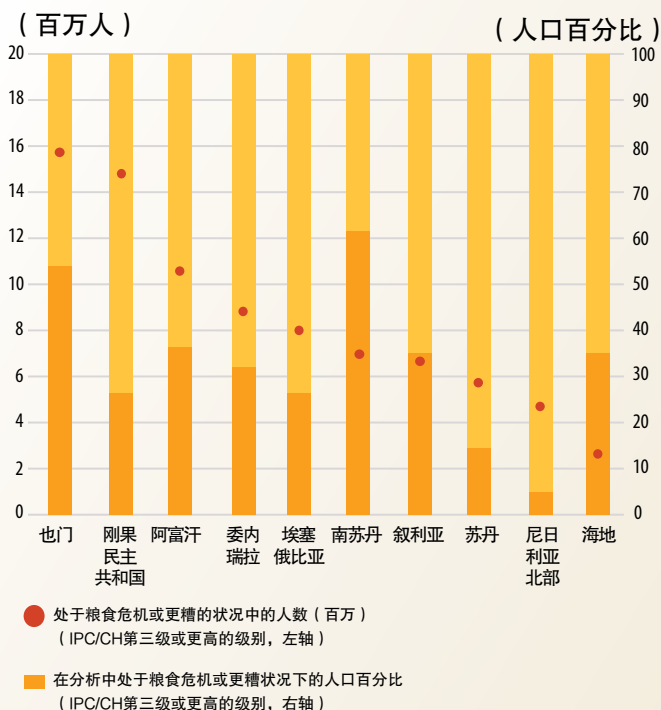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粮食安全信息网络,《2020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

注: M=百万人

冲突、天气和经济冲击是根本原因

十大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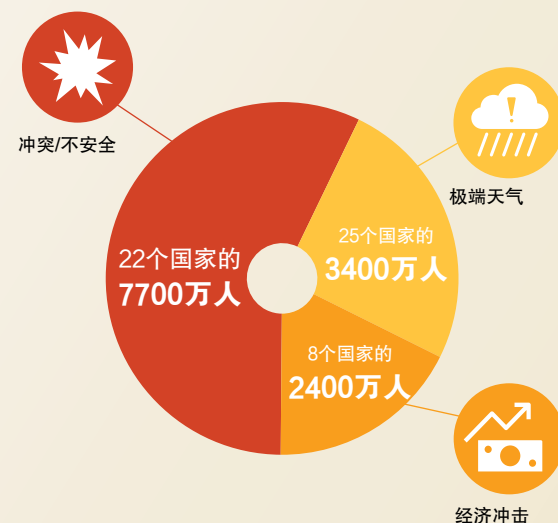
从拉丁美洲到中东，许多地区都受到了2019年十大最严重粮食危机的影响。



资料来源：粮食安全信息网络，《2020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
注：DR Congo=刚果民主共和国

环境已变

冲突/不安全仍然是2019年粮食危机的主要因素，但极端天气和经济冲击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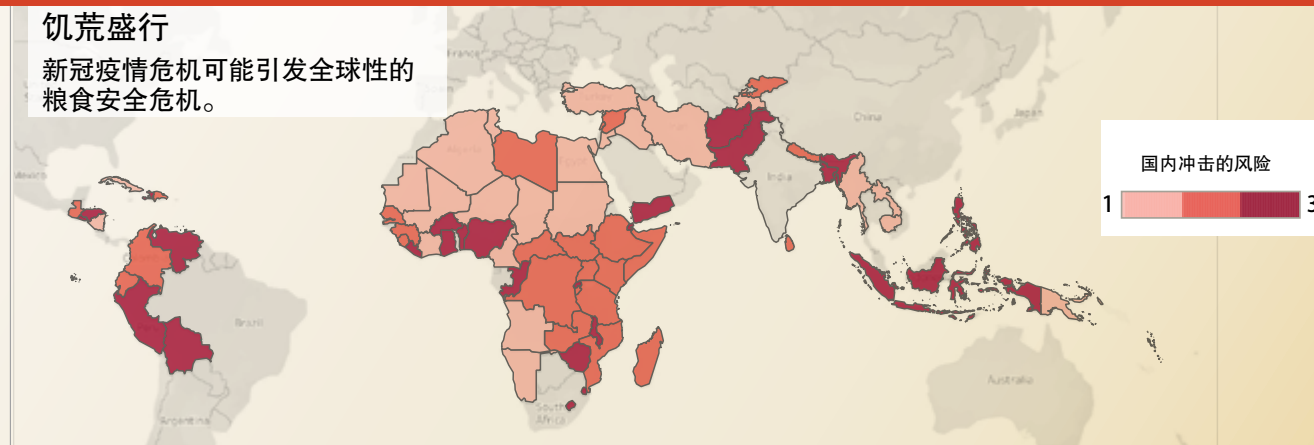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粮食安全信息网络，《2020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
注：M=百万人

预计2020年将出现大范围饥饿现象

饥荒盛行

新冠疫情危机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粮食安全危机。



资料来源：Husain, Sandström, Greb, Agamile. 2020. "Economic and Food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World Food Programme.

注：世界粮食计划署对83个国家的供应链中断和收入损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本地图根据调查结果绘制，显示了2020年全球粮食不安全风险。颜色为深红色的国家风险最高，中度红色代表中等风险，浅红色代表最低风险。灰色国家未纳入分析。

什么是债务可持续性？

一个经济体能够安全承担多少债务，取决于多个因素

达莉亚·哈库拉



国家通过举债形成债务。通过举债，国家可以为重要的发展计划和项目提供资金，但是，如果债务过度，偿还债务的负担会压垮一国财政，在最坏的情况下会导致债务违约。

近年来，低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务持续增加，这引发了人们对这些国家维持债务水平的担忧。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各国力求降低危机对国民健康和经济的影响，相关支出需求随之增加，并由此导致公共债务水涨船高，这可能加剧各国实现经济发展和控制债务脆弱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当债务可持续时

债务工具是一种金融债权，要求债务人在未来某个约定日期向债权人还本付息。国家会向各种各样的债权人举债，包括私人债券持有人、银行、其他国家及其官方贷款机构以及世界银行等多边贷款机构。

如果一国政府能够在不需要额外财政援助或不违约的情况下履行其当前和未来的所有支付义务，那么该国的公共债务将被认为是可持续的。分析师着眼于该国所采取的与稳定债务有关政策是否可行，能否满足其保持增长潜力或经济持续发展的要求。当国家从金融市场借款时，与再融资相关的风险也很重要。

公共债务的定义因其用途而异。常用的一个狭义定义涵盖了中央政府的预算单位。其广义定义则涵盖了一般政府（中央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预算单位，以及预算外单位和社保基金）。

公共债务最广泛的定义除了一般政府之外，还纳入了公共非金融和金融公司，包括中央银行。此外，其还包括得到公共部门担保的债务（公共部门不持有这些债务，但有担保义务）和外部公共债务（非该国居民持有的债务）。

要正确评估一国的债务可持续性，就必须涵盖对该国公共财政构成风险的所有类型的债务。

只关注狭义的公债概念会导致债务的意外增加。例如，如果一家总是亏损的国有企业无力偿还债务，负担最终会落在中央政府身上，因为这种债务是由政府担保的，这会导致该国的债务可持续性意外减弱。

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对债务可持续性的分析更多关注一般政府（但也绝不是仅仅如此）。但是，在低收入国家，该项分析的标准做法几乎完全覆盖了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

公共债务的持有者也很重要。IMF 和世界银行对债务可持续性的评估涵盖了国内公债和国外公债。不过，关注债务危机风险的主权信用评级机构通常只关注基于市场的国外公债。

为何拥有一定的债务是有益的

如上所述，公共债务是为发展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多种筹集资金的方法，如增加国内收入、提高支出使用效率、减少腐败和改善商业环境。但这些方法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来实现，而且通过其筹措的资金可能并不足够。

各国应尽可能保持债务的可持续性，并确保债务不会危及增长和稳定。不可持续的债务会导致债务危机，即国家无法履行其还款义务，从而需要进行债务重组。违约不仅会损害经济增长和投资，还会导致借款国无法再入市融资，并承受更高的借贷成本。

对于考虑是否举借新债的国家来说，有三个关键因素需要考虑：

- 新的借款应当与财政支出和赤字计划保持一致。新的借款应谨慎设定额度，使公共债务尽可能保持在可持续的轨道上。

- 国家应采取一种综合性方法，将缩减债务的好处与增加债务的成本进行比较。为生产性社会支出和基础设施支出进行融资的债务可以增加收入，最终可能抵消偿债成本，并有助于平衡债务可持续性的风险。

- 国家应努力在综合性中期债务管理战略的背景下改善债务报告和债务统计。债务统计应包括尽可能广泛的公债和公共担保债务，包括国有企业的债务。政府与贷款人共享这类数据，可以鼓励负责任的贷款。

多少债务才算太多？

多个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在负担变得过于沉重之前能够承受多少债务。国家的债务承受能力取决于多项因素，其中包括机构质量和债务管理能力、政策和宏观经济基本面等。国家的债务承受能力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为该项能力也会受到全球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

在IMF用于评估低收入国家和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国家债务可持续性框架中，考察了借款

国的债务负担能力。IMF参照以往具有类似经济特征的多个国家的债务危机，对评估进行调整。调整过程中将产生与关键公债指标有关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阈值，如果其指标超过(或预期将超过)阈值，则表明风险较高；该阈值既可以反映出历史信息，也可以传递关于未来债务危机的信息。

另一个框架考察债务预测和偿债指标预测中的不确定性。这是通过扇形图和压力测试来完成的。由于所有评估均以对债务、利息和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预测为基础，因此这两个框架也都依赖工具来帮助其衡量评估结果的可信度。IMF债务可持续性的评估方法也为通过判断进行良好决策预留了空间。

疫情期间出现一个问题是，债务负担能力是否已经提高到足以应对债务上升的程度。毕竟，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低利率显著提高了各国的举债能力。

但这不一定可以转化为更高的债务偿还能力。即使在利率较低且有充足资金可用的情况下，经验表明，国家的负债能力也是有限的，对不断增加的偿债负担要谨慎管理。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经济增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较高的经济增速可改善债务状况。事实上，过去大多数未进行重组就实现债务大幅削减的案例均涉及经济快速增长。然而，在许多这类案例中，其增长多是由国家控制之外的因素驱动的，例如全球经济繁荣、自然资源出口的不断增长或贸易条件的改善(商品出口价格相对较高，进口价格相对较低)。

在缺少这类外部刺激的情况下，要想在较长一个时期内持续实现国内增长可能会较为困难，而且可能还需要新的债务，例如为公共投资提供资金。鉴于目前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相关国家需要认真对待偿债管理，而加强债务管理和债务数据应成为其当务之急。FD

达莉亚·哈库拉(DALIA HAKURA)是IMF战略、政策和检查部副处长。

赢回那些被遗忘的人

马丁·桑德布 (Martin Sandbu) 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政策计划，以重新建设一个让每个人都有归属感的经济。他的经济学分析精巧而复杂，文笔引人入胜，如果你经常阅读他在英国《金融时报》“免费午餐”专栏上发表的文章，你大概并不会对此感到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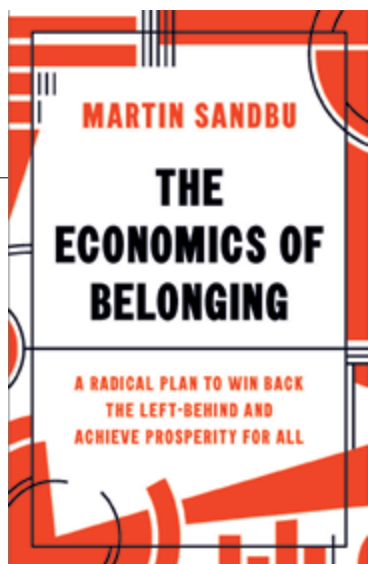
本书的背景：在当前反自由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背后，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即经济机会

国外的新移民，但是他们反对移民流入。他认为，经济上的不满会以文化反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拥护强有力的领导人，因为那会给他们一种集体控制力的幻觉，而这能弥补个人对经济环境掌控的不足。如果桑德布的评估认为文化反动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经济因素造成的，那么改善经济政策就有助于让当前这个基于民主和全球化的政治和经济模式恢复活力。

他提出的一揽子政策突破了经济学共识的边界，不过，如果你关注了近期的辩论，你并不会对其内容感到震惊。其中的关键内容包括净财富税、全民基本收入（或负所得税）以及碳税和碳红利。桑德布从他的祖国挪威借鉴了一些经验（中间还穿插了一个有趣的对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自动洗车场和美国的劳动密集型洗车场），呼吁实行事实上的最低工资。这些措施将迫使雇主选择更具生产力的流程，而不是创造低技能型的工作岗位。为了避免低技能人群的失业风险，他呼吁政府加大教育和再培训支出，同时加大对需求的刺激。经济学家将十分乐于讨论这些政策的利弊。桑德布合理地指出，这些政策是互为补充的，必须作为一揽子政策整体推出。

本书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详细介绍了近年来围绕民主/全球化模式选举难题的底层因素展开的各种经济分析。我希望作者能在政治说服这门艺术上多些探索。即使民众的不满情绪最终根源在于经济，但假如其传递出的政治信息可以与人们的道德倾向产生共鸣，就更容易在议会获得通过。桑德布朝这个方向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例如，他针对全民基本收入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右翼观点。他还指出，那种零敲碎打的改革方式可能比他雄心勃勃的一揽子计划更容易遭到阻挠。就个人来说，我希望在桑德布的下一篇专栏文章和下一本书中能看到更多关于如何克服政治障碍的分析。FD

保罗·莫罗 (PAOLO MAURO) 是IMF财政事务部副主任。



马丁·桑德布
归属经济学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2020年，296页，24.95美元

是为精英人群保留的，而“普通人”并不属于精英。

许多有影响力的作家，如《文化反动》(Cultural Backlash) 的作者皮帕·诺里斯 (Pippa Norris) 和罗纳德·英格哈特 (Ronald Inglehart) 都曾提出证据，证明在对个人政治选择进行解释时，个人价值因素论要胜过经济因素论。更坦率地说，根据这些作者的观点，那些投票反对移民的人更喜欢“自己的同类”。他们的言外之意是，全球化发展得太快了，需要放慢速度，让当地居民能够保护自己的文化。

然而，桑德布指出，相对于个人层面，经济驱动力在地方层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去往经济衰退地区的移民很少——事实上，他们无法吸引来自

体系的缺陷

无论它的标题所指为何,《愤怒经济学》(Angrynomics)绝不仅仅关于愤怒和经济学。事实上,它由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组成:过去150年的资本主义历史,对当前不满(愤怒)的分析,以及对未来的一系列建议。

这本书由一系列引人入胜的短篇故事和“柏拉图式的对话”构成,目标读者为广大公众。书中内容立足于许多领域及作者的学术研究,包括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和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精神病学家亚伦·贝克(Aaron Beck)和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两位作者需要充分利用这些大家的智慧来实现他们雄心勃勃的目标:挖掘当前经济问题引发愤怒的原因,并提出解决办法。

埃里克·朗尼根(Eric Lonergan)和马克·布里斯(Mark Blyth)通过区分公众愤怒的“善”和“恶”来展开本书中的讨论。所谓的“善的愤怒”源于人们对社会违规者的道德义愤,而“恶的愤怒”则是一种非理性的部落性的能量,被民粹主义政客出于政治目的所操纵。在作者看来,由于宏观经济趋势(工资停滞、不平等、资产泡沫)和对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机不当应对措施的愤慨,近期的公众愤怒(大部分)是善的。尽管本书是在此次疫情之前写的,但它仍然提供了一个可用于分析新冠疫情危机影响的框架;毕竟,疫情危机只是在此前宏观挑战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一些微观压力。

两位作者认为,纵观近代历史,资本主义制度好比一台反复崩溃的计算机。但是,和大萧条或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等以往系统性危机不同的是,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从未成功重启。这意味着,尽管各国政府成功修复了资本主义1.0(大萧条前)和资本主义2.0(凯恩斯主义时期),但这一次,在某些缺陷导致系统崩溃之后,资本主义3.0(我们的新自由主义时期)却一直无法重启。

这些软件缺陷到底是什么?工资停滞、资产泡沫、过度的银行杠杆和不平等。本书对此做了



埃里克·朗尼根、
马克·布里斯

愤怒经济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纽约州纽约市,

2020年,192页,30.00美元

十分细致的探讨,或许它还可以更深入地探究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因为这些问题既是经济体系自身的产物,同时也是某些导致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的事件的结果。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讨论了各种提议,包括直升机撒钱、双重利率、财政委员会、利用授权筹集资金、主权财富基金以及碳税,等等。遗憾的是,这些措施中的大多数以前都曾被提出过,并且其中包括众所周知的一些经济弊端。不过,两位作者最有趣的想法是主权财富基金,他们建议各国政府更积极地利用该种基金,利用公共债券的低(或负)利率去投资股市。新冠疫情危机为这些基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安全资产的利率甚至更低,股票价格也在下跌。

总的来说,《愤怒经济学》向读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有助于人们在更广阔背景下理解当前的政治事件。此外它也非常有先见之明,它勾勒出了一个关于微观和宏观压力的概念框架,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理解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对我们社会的影响。FD

安东尼奥·斯皮林堡(ANTONIO SPILIMBERGO)是IMF研究部副主任。

创造历史

突尼斯以新版10第纳尔纸币纪念该国第一位女医生

梅琳达·韦尔

几年前，突尼斯央行的一个小组着手重新设计该国的一些纸币，他们决定利用10第纳尔的纸币来纪念一位当代人物，一个曾对他们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用央行行长马鲁万·埃尔·阿巴西 (Marouane El Abassi) 的话来说：“一位能够代表突尼斯专业能力的旗手级人物。”

他们选择了已故的突尼斯第一位女医生塔维达·本·谢赫 (Tawhida Ben Cheikh, 1909-2010)，作为于2020年春天首次发行的新版纸币的正面人物肖像。

本·谢赫一生曾获得众多第一，她是突尼斯第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女学生 (1928年)，据报道称还是第一个获得医学学位的北非穆斯林女性 (1936年毕业于巴黎大学)。人们还认为，她不仅

是突尼斯甚至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位现代女医生。

作为第二位个人肖像出现在突尼斯货币上的女性，本·谢赫再次创造了历史，尽管是在她已故之后。第一位则是传说中的古代迦太基的缔造者和女王艾丽莎 (Dido)，她曾于2005年首次出现在该国的10第纳尔纸币上。据报道，这个新版纸币也是世界上第一张纪念女性医生的纸币。

埃尔·阿巴西说：“我认为很明显的一点是，我们需要一位来自当代的人物。”接着他又补充说，他们并没有十分明确地想要寻找一位女性，“经过十年前的那场革命之后，我们希望我们的纸币能成为整个国家的一面镜子。”

影响力

本·谢赫回到突尼斯后开设了一家私人诊所，她对所有病人一视同仁，无论其国籍或经济能力如何。此后多年，她一直是该国唯一的女性医生，在突尼斯的医学、计划生育实践和立法方面逐渐积累起影响力；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她创立了该国第一家计划生育诊所，并领导了关于避孕和堕胎的运动，推动了避孕和堕胎在1965年首次在一定程度上合法化。本·谢赫是突尼斯医生协会全国委员会接纳的第一位女医生。在她职业生涯的后期，她曾担任突尼斯红新月会的副会长。

本·谢赫出生在一个保守而富裕的家庭，尽管曾遭到男性亲属的反对，但她仍然获得了接受高水平教育的机会，她认为这归功于她寡居的母亲的支持；在当时仍属于殖民地的突尼斯，女性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据埃尔·阿巴西说，在近一个世纪之后的现在，突尼斯的高等院校中女性学生的数量有了很大提高，已占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2018年，突尼斯被阿拉伯联盟指定为“2018—2019年阿拉伯妇女之都”，以表彰该国在提高妇



突尼斯于2020年春天发行的新版10第纳尔纸币。纸币正面是塔维达·本·谢赫博士的肖像，背面是精细的柏柏尔陶器和珠宝。



女地位方面所做的努力。

新版 10 第纳尔纸币由突尼斯艺术家阿里·法赫特 (Ali Fakhet) 设计，主体色彩为碧蓝色，其他特征包括：

- 正面为本·谢赫的肖像
- 背面为手工制作、做工复杂而精巧的柏柏尔陶器和珠宝图像
- 防伪细节，如三维线、荧光涂层、微文本印刷、具有旋转式动感效果的圆环、半透明特征以及暴露在紫外线下会发光的荧光纤维

适时的致敬

埃尔·阿巴西表示，除了纪念本·谢赫的精神遗产和由她所激励的一代又一代的女性，新版纸

币还意在纪念所有突尼斯女性的贡献。

尽管这张纸币是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设计的，但不影响它在危机期间向突尼斯医生和其他关键岗位的医疗卫生工作者（主要是女性）致敬。埃尔·阿巴西说：“对那些正在突尼斯抗击疫情的医生和卫生保健工作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

埃尔·阿巴西表示，公众对新版钞票的反应十分积极。为了更好地接触到突尼斯的年轻人，突尼斯央行与当地一家初创公司合作开发了一款增强现实应用软件“Flouss”，用来讲述纸币背后的故事。FD

梅琳达·韦尔 (MELINDA WEIR) 是《金融与发展》的工作人员。

1930年，塔维达·本·谢赫和其他北非穆斯林学生协会的成员在巴黎。之后，本·谢赫将成为突尼斯和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位女性医生，并将成为突尼斯红新月会的副会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新冠疫情正以令人心痛的方式夺去人们的生命，并严重破坏了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且已达到我们有生之年所未见的规模。要确保紧急融资能够到达有需要的人手中，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帮助。

新冠疫情 对全球经济有什么影响？



我们为在疫情中丧生的人们所能建造的最好
的纪念碑，是一个更绿色、更智能、更
公平的世界。

克里斯塔莉娜·格奥尔基耶娃
IMF总裁

Finance & Development, September 2020



MFICA2020003